

# 19 世紀林圯埔竹材流通與 鹿港海岸變遷的關聯\*

楊朝傑\*\*

## 摘 要

從 18 世紀末一直到 20 世紀初這一百多年間，中臺灣林圯埔沿山地帶的地景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原始雜木樹叢逐漸被滿山遍野的竹林所取代。林圯埔沿山這一地景變化的根本原因，其實是由於 19 世紀臺灣西部海岸的環境變遷。本文觀察中臺灣鹿港海岸地帶，發現當地自然環境變遷，一方面造成海岸浮覆沙埔地出現，使得沿海養蠔業繁盛，插竹養蠔的做法帶動對竹材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鹿港港道淤積阻塞，以竹子編排組成的竹筏在當時成為普遍使用的運輸工具。這些因素導致竹材生產與需求增大，尤其在清水及濁水兩溪的便捷水力支持之下，竹材能夠大量且快速地輸出流通，進而推動竹林產業的高度發展，最終造就林圯埔沿山地帶成為竹林優勢的地景。我們可以這麼說，竹材在林圯埔沿山地帶栽植與普及，反映了山林與海岸之間互相銜接的連動關係，這一實例可以提供我們理解清代臺灣民間經濟活動與商品流通。同時，這一連結山海的經濟活動，也顯示出漢人活動從西部平原推向沿山，由海口走向山區，成為 19 世紀臺灣重要的社會動態。

關鍵詞：濁水溪、竹筏、牡蠣養殖、山林地景、竹林產業、竹山

---

\* 本文得以刊登，感謝匿名審查人提出的建議與修正意見，對本文的完整性相當有助益。同時也感謝李文良、林玉茹、吳玲青、曾品滄、鄭螢憶、曾獻緯、盧正恒等師友，在本文撰寫期間惠予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來稿日期：2023 年 10 月 31 日；通過刊登：2024 年 4 月 16 日。

- 一、前言
  - 二、從竹林到竹材
  - 三、「放排」(pàng-pài)：竹材的水上流通
  - 四、海岸變遷與竹材運用
  - 五、結論
- 

## 一、前言

清代林圯埔沿山地帶歷經了地景變化，<sup>1</sup> 並與全臺沿山產業發展歷程中的竹林產業關係密切。有關林圯埔地區山林景觀的描繪，最早可見於 18 世紀末清廷在臺灣的戰役繪圖。1788 年（乾隆 53 年）林爽文事件平息之後，乾隆皇帝將自稱的「十全武功」製為銅版刻畫，留下難得的戰役圖。<sup>2</sup> 在製作銅版畫之前，乾隆皇帝特別指示協辦大學士將軍福康安在臺灣聘僱畫工，繪製包括小半天、集集埔、水沙連等 8 場戰役，爾後福康安又自行命人添繪其他 8 場戰役繪圖，做成《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圖冊，供乾隆皇帝御覽。<sup>3</sup> 「小半天克捷圖」、「水沙連克捷圖」即是收錄圖冊中少見且重要的戰役繪圖，不僅描繪戰役當時大批官兵奮勇殺敵的情況，戰地現場的地形山勢、溪流及林相景觀也躍然紙上。其中，「小

---

<sup>1</sup> 本文所指清代林圯埔地區，廣義範圍包括沙連保（今南投縣竹山鎮、鹿谷鄉，以及濁水溪北岸的集集鎮、名間鄉一部分）及鯉魚頭保（今竹山鎮桶頭、瑞竹、坪頂、福興、鯉魚里及田子里一部分）。

<sup>2</sup> 有關清宮藏銅版畫《平定臺灣圖》的研究留下豐碩的成果，請參閱盧雪燕，〈鏤銅鑄勝：院藏清宮得勝圖銅版畫〉，《故宮文物月刊》（臺北）293（2007 年 8 月），頁 40-51；李泰翰，〈清乾隆年間臺灣戰圖製作經緯〉，《故宮學術季刊》（臺北）25:2（2007 年 12 月），頁 139-178；高宜君，〈毫芒之測：乾隆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銅版畫探微〉，《故宮文物月刊》392（2015 年 11 月），頁 70-82；周維強，〈銅版汗青：欽定平定準噶爾回部戰圖之委法製作〉，《故宮文物月刊》393（2015 年 12 月），頁 4-17。

<sup>3</sup> 關於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銅版畫《平定臺灣圖》的比較研究，請參閱盧正恒，〈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的繪圖觀點及與銅版《得勝圖》比較〉，《臺灣史研究》（臺北）28:4（2021 年 12 月），頁 41-120。

半天克捷圖」的布局可見高插雲霄的山勢，溪水從中流瀉而出，窄狹的山徑兩旁多為樹叢雜木。<sup>4</sup> 另一幅「水沙連克捷圖」展現峰巒疊翠的山景，畫面左側是濱臨溪流的淺山丘陵地帶，局部山坡已有竹林出現。<sup>5</sup> 這兩幅戰役繪圖明顯呈現了山林地景的差異，小半天（今南投縣鹿谷鄉）的畫面為樹木叢生，未見竹林，而林圯埔一帶只在淺山得見零星的竹林蹤跡，可以說竹林在這片廣袤的林圯埔沿山地帶的占比相當有限。

林圯埔地區在 18 世紀末的地景，由上述戰役繪圖中可以得知是以樹叢雜木為主，夾雜若干竹林。留存於南投竹山連興宮廟內，<sup>6</sup> 1824 年（道光 4 年）的〈嚴禁勒索竹排船伏碑〉的文字描述則是：「沙連保民附山居住，生產竹木縛結成排，由清、濁兩溪載運出售」，<sup>7</sup> 具體說明沙連保當地居民依山而居，經營竹林產業，並將竹材成捆的竹排，靠著清水及濁水兩溪的水力，放流到外地販售。當時沙連保共計 35 庄，<sup>8</sup> 大規模投入竹材生產，顯示林圯埔地區此時已是出產竹材之地。

20 世紀之初，日本人認為林圯埔的淺山丘陵地帶是全臺規模最大的竹材產地。三菱製紙株式會社調查報告中指出：「竹林最豐富是嘉義、斗六兩廳的阿里山西側，占全臺竹林面積一半以上，特別是斗六廳清水溪沿岸大密林」。<sup>9</sup> 閱讀這段描述後，我們彷彿可以看見林圯埔所在的濁水溪及清水溪流域山區，滿山遍野盡是竹林叢生的景象。

從上述三個時期對於林圯埔沿山地帶的描述，我們可以知道從 18 世紀末一直到 20 世紀初的一百多年間，當地的地景出現了明顯的變化，竹林景觀逐漸取

<sup>4</sup> 盧正恒，〈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的繪圖觀點及與銅版《得勝圖》比較〉，頁 80。

<sup>5</sup> 盧正恒，〈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的繪圖觀點及與銅版《得勝圖》比較〉，頁 68。

<sup>6</sup> 連興宮為當地跨村際的廟宇，信仰範圍清代為沙連堡，今則為南投縣竹山鎮及鹿谷鄉，相關討論請參閱莊英章，〈林圯埔：一個臺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7），頁 140-142。

<sup>7</sup> 〈嚴禁勒索竹筏錢文示禁碑〉，收於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6），頁 140-141。

<sup>8</sup> 周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彰化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上冊，頁 151。

<sup>9</sup> 三菱製紙株式會社社史委員會編，〈三菱製紙六十年史：1898-1958〉（東京：三菱製紙株式會社，1962），頁 140。

代原始雜木樹叢，高度發展成為淺山丘陵地帶最主要的林相，甚至造就全臺灣最大竹材產地的誕生。具體而言，從 19 至 20 世紀之間，林圯埔竹林面積不斷擴大，全盛時期達到 1 萬餘公頃，占全臺竹林總面積的 20% 至 30%，產量更為全臺第一，<sup>10</sup> 後來林圯埔改名為竹山也與此有關。<sup>11</sup>

本文試圖從竹材生產與需求增大的問題出發，追溯林圯埔沿山地景變化的根本原因。同時，在進一步探尋竹林用途時，發現 19 世紀林圯埔山林景觀變動之際，臺灣西部沿海也同樣面臨自然環境的變遷。其中，本文稱「鹿港海岸」的這片位在大肚溪以南、西螺溪（今濁水溪主流）以北的沿海地區，是清代臺灣中部最大港口鹿港及其外口番挖、王功（今彰化縣芳苑鄉）等港分布的區域，在 19 世紀也發生自然環境劇烈的變動，即濁水溪的溪水氾濫，夾帶大量砂石沖刷入海，一方面造成大規模海岸浮覆沙埔地的出現，另一方面導致港道的淤積阻塞。沿海居民在面臨環境變遷時所發展出的因應辦法與生業型態，開展出竹林產業與沿海地方的連結。換言之，究竟臺灣西部沿海的自然環境變遷，如何促進林圯埔地區竹林產業的形成與擴張？竹林產業的發展又如何影響山林景觀？為本文亟欲探討的問題。

本文透過對鹿港海岸的自然環境變遷與竹材運用的觀察，企圖論證林圯埔山林與鹿港海岸之間互相銜接的連動關係，並闡述林圯埔竹材由山林通往鹿港沿海的具體歷史過程。因此，文獻回顧將以林圯埔竹林產業研究及鹿港港口商品交易兩方面來討論。

首先，林圯埔竹林產業的相關研究主要從探討沿山土地開墾歷史，說明林圯埔的山坡地形有利於竹林產業的發展。張永楨及黃素真運用民間留存的清代契約文書，指出林圯埔沿山地帶山多田少的地理環境，雖然不利於稻作農耕，但山坡地卻適合發展竹林產業。<sup>12</sup> 由此可見自然條件對於竹林產業發展具有關鍵影響。

<sup>10</sup> 曾獻緯，〈日治時期竹山地區的竹林產業發展〉，《暨南史學》（南投）13（2010 年 7 月），頁 110。

<sup>11</sup> 安倍明義編，《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1938），頁 206；新道滿編，《口-マ字發音臺灣市街庄名の読み方》（東京：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38），頁 79。

<sup>12</sup> 張永楨，〈清代竹山、鹿谷地區的農作經營：以古文書和文獻互相印證〉，收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等編校，《第四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逢甲大學出版社，2010），頁 39-76；黃素真，〈土地、國家與邊陲社會：林圯埔大坪頂的地方性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2009）。



此外，曾獻緯聚焦於竹林產業在殖民政府與地方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並透過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資料，說明國家權力試圖改造林圯埔地區傳統的竹林產業，促使該產業邁向高峰，躍升成為國際貿易的商品，持續帶動林圯埔日治時期竹林產業的繁盛，反映政府政策在竹林產業發展上的角色。<sup>13</sup> 藉由上述研究可知，林圯埔淺山丘陵地帶的地理條件，最適合發展竹林產業。雖然林圯埔竹林產業進入日治時期一度發展外銷，但這一區域產業本質仍與清代一樣，是以供給臺灣島內市場需求為目標。

竹林產業得以蓬勃發展成為林圯埔的區域產業，關鍵就是竹材在臺灣島內早就具有商品價值。關於臺灣農產商品化的討論，涂照彥與林滿紅認為臺灣與中國大陸頻繁的貿易關係，推動島外貿易市場的擴張，帶動了臺灣農業高度商品化的現象。<sup>14</sup> 事實上，竹林產業早在日治時期推動外銷以前就已具備商品價值，並與島內市場需求關係密切。換言之，臺灣島內市場的形成也是造就區域產業商品化的重要因素。<sup>15</sup> 本文探討林圯埔竹材銷往鹿港流通的歷史，即是為了釐清中臺灣鹿港海岸地帶竹材市場的發展，如何帶動林圯埔沿山竹材商品化，從而造就竹材產銷成為林圯埔最主要的區域產業。

其次，有關鹿港港口商品交易的研究，林玉茹累積豐碩的成果。她指出乾隆末年朝廷因應臺灣北、中部的開發，以及將中臺灣米穀配運至對岸的需要，陸續開設鹿港與福建泉州蚶江、八里坌與福州五虎門對渡，自此臺灣也從鹿耳門出入的單口對渡政策，轉為三個正口對渡的格局。其中，1784 年（乾隆 49 年）鹿港設立正口之後，逐漸發展成一個以該港為核心的區域型經濟區。其範圍北自大甲

<sup>13</sup> 曾獻緯，〈日治時期竹山地區的竹林產業發展〉，頁 107-158。

<sup>14</sup> 涂照彥認為：「通過與對岸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導致農產品市場不斷擴大，商人及高利貸資本的侵入，從而顯現商品經濟關係的擴大。」請參閱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1），頁 20-25。林滿紅亦持相同觀點，參閱林滿紅，〈貿易與清末台灣的经济社会变迁〉，收於吳松弟主編，〈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頁 138-157。

<sup>15</sup> 曾品滄以臺灣西南沿海的養殖魚業為例，強調 19 世紀以來，西南沿海的魚塭養殖雖是以滿足島內消費市場為目標的地方型產業，但它卻因臺灣府城市場的消費需求，使得養殖活動朝向商品化發展，又因為魚塭經營具成本高、風險大的產業特性，從而導向資本化與專業化的趨勢，最終發展成為臺灣西部沿海重要的產業。此一研究視野，提醒我們重新思考清代臺灣島內的市場需求因素對於竹林產業發展的影響。請參閱曾品滄，〈塭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臺灣史研究》19: 4（2012 年 12 月），頁 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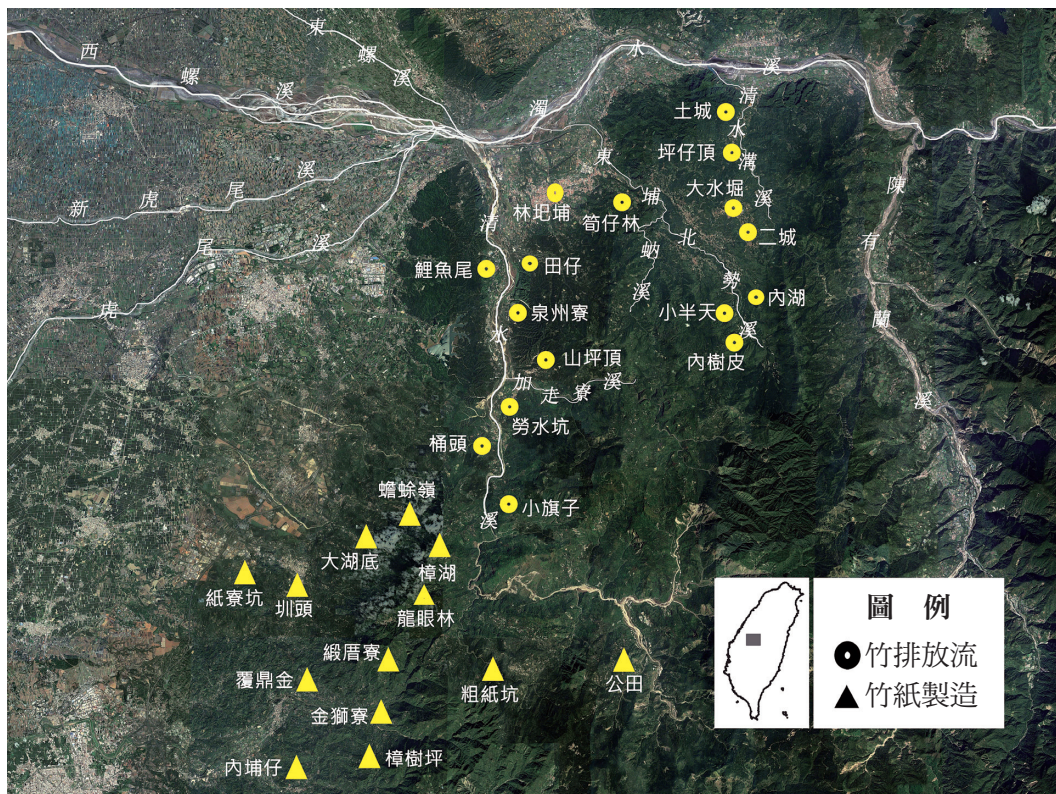


圖 1 從事竹排放流及竹紙製造主要聚落分布圖

資料來源：依據黃素真，〈土地、國家與邊陲社會：林圯埔大坪頂的地方性詮釋〉，頁 284-299；張毓哲，〈日治時期古坑沿山地區的竹紙產業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頁 34-36。由筆者改繪自 Google Earth。

溪，南至八掌溪，其下包括三林港、海豐港、笨港及水裡港（即梧棲港）等三個次級經濟區。上述沿海港街基本透過陸路聯繫內陸重要街市，得以將經濟區內的產物輸往對岸福建，從而勾勒福建與鹿港區域型經濟區兩地間港口貿易的網絡。<sup>16</sup>但相對於鹿港與對岸貿易清晰的網絡圖像，鹿港腹地與內陸街市的物流網絡卻顯得模糊。究竟林圯埔竹材如何從沿山地帶流通至鹿港海岸，又港埠海岸地帶的市場需求如何影響沿山產業的發展，是值得釐清的課題。

<sup>16</sup> 林玉茹，〈清中叶台湾三大区域型经济区的成立（1784-1850）〉，《东北史地》（長春）2015:1（2015年1月），頁 58-69；林玉茹，〈第三篇 近代台湾经济地理（清统治时期）〉，收於吳松弟主編，《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第六卷）閩台近代经济地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頁 339-345。

由上述討論可知，林圯埔沿山或鹿港海岸地帶的經濟活動的研究，皆累積一定成果，但相較於沿山或沿海各別的深刻研究，其實我們較少留意山海之間的連結關係，而侷限了我們對於區域經濟活動的理解。因此，本文探討林圯埔竹林地景的生成原因與鹿港海岸自然環境變遷的關聯，就要釐清山林與海岸兩地如何產生連動，也就是透過什麼機制產生何種連結。

總之，本文從林圯埔的地景變遷，討論 19 世紀當地竹林產業的發展過程，釐清 20 世紀全臺最大規模竹林產地的生成原因，也就是市場需求的因素如何造就林圯埔地區竹林產業的高度發展。首先探討 19 世紀竹材如何發展成為山林經濟的代表商品，其次討論竹材的水上流通，後續再從彰化平原及海岸地帶的自然環境變遷角度切入，探討竹林產業與市場需求之間的關聯，期待從商品流通的角度分析 19 世紀彰化平原沿山與濱海地區的互動關係，以作為清代臺灣民間交易與商品流通的研究基礎，並有助於理解中臺灣歷史的發展動向與區域特色的掌握。

## 二、從竹林到竹材

林圯埔地區成為臺灣西部主要的竹材產地，與當地的自然環境關係密切。首先，竹子適合生長在少風且乾濕度適中的山谷或平原。林圯埔地區正好位在濁水溪中游東南側的淺山丘陵地帶，每年春夏之際，水氣在西海岸的海風吹拂之下，受到當地地形阻隔而容易降下地形雨，多雨且溫濕的特性，成為竹類植物有利生長的環境。<sup>17</sup> 其次，林圯埔地區山多平地少、河階切割分散的地理環境，侷限稻作農業發展，但卻適合竹類栽種。這一產業特色亦具體反映在〈清水溝地方出產誌略〉中：「細查清水溝一帶之竹一年計共換賣金約有數千之多，所以此處人民雖在山間，少有田園，其所收之金亦與平洋田園多少無異」，<sup>18</sup> 可見林圯埔淺山丘陵地帶雖不利稻作農耕，但竹林經營活動的收益卻不亞於米穀經濟，成為最適合當地的土地利用方式。

<sup>17</sup> 王子定、郭寶章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之竹林與竹材》（臺北：臺灣銀行，臺灣研究叢刊第 14 種，1951），頁 13；陳哲三總編纂，《竹山鎮志》（南投：竹山鎮公所，2002），頁 754。

<sup>18</sup> 〈清水溝地方出產誌略〉，收於不著撰者，《集集堡紀略》（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無頁碼。

## （一）竹林栽種歷史

林圯埔的淺山丘陵地帶是清代臺灣中部竹材重要的產地。1894年（光緒20年）雲林縣訓導倪贊元纂輯的《雲林縣采訪冊》中，對於沙連保境山區產竹之事多有描述，諸如小半天山「山上民居不一，有邨曰中湖、曰內湖，煙火將及百家。所產貓兒筍、蔴竹筍，為居民之利」；鳳凰山「所產大竹，可以編筏、蓋屋、製紙；筍則製以為脯，民賴其利」；大人嶼山「筍竹成林，沿山多置紙寮」；大順嶺「嶺上下竹林、樹木布滿巖隈」。<sup>19</sup> 透過上述引文，我們可以想見19世紀末林圯埔的淺山丘陵地帶，滿山遍野盡是竹林密布的景象，山間居民靠著販售竹子、採擷竹筍、製造筍乾、竹紙等竹林產業維生。這樣的產業景象及山林地景其實迥異於18世紀。誠如前言所述，在林爽文事件戰役繪圖中所呈現的小半天山景地貌，不見竹林密布，與19世紀方志描述小半天當地「所產貓兒筍、蔴竹筍，為居民之利」的情景不同，顯然地景經歷了一番變化，值得進一步討論。

19世紀末小半天當地成為竹林廣布的山景，究竟林圯埔地區的竹林是自然生成？抑或是人為刻意栽植？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教授竹內叔雄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我們觀察的依據。他的研究指出，林圯埔一帶的蔴竹是1756年（乾隆21年）由業戶許廷瑄的佃人劉玉麟，從中國移植後栽植在筍子林（今南投縣竹山鎮延山里）的小半天溪（今北勢溪）沿岸，後來陸續被移植到內樹皮、內湖、大水堀、坪仔頂等地（以上皆為今鹿谷鄉）；鳳凰山麓一帶的蔴竹則是由林圯埔的陳進秀栽植。<sup>20</sup> 此外，當地的桂竹亦由劉玉麟由中國移植，差不多也在1756年左右。至於當地孟宗竹的來源，據說最早由福建漳州府南靖縣移民將竹苗栽種於小半天，隨著竹子長成後，才分別被移種到鹿谷、內樹皮、大水堀、車軌寮（以上皆為今鹿谷鄉境）等地。<sup>21</sup> 雖然無從得知竹內叔雄說法的來源，但可以瞭解的是，林圯埔地區在乾隆初年曾出現一波拓墾的熱潮，<sup>22</sup> 並與竹子成為當地

<sup>19</sup> 倪贊元纂輯、張光前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雲林縣采訪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1），頁220-222。

<sup>20</sup> 傳言劉玉麟所有蔴竹林的竹子數目要比平地某糖廠的甘蔗數量還多，當時的面積據說有「九湖十三崙」，至於「九湖十三崙」的確切地點，不得而知。林長金，〈社子國營造林地に於ける蔴竹の造林並栽培經營法に就て〉，《旗山の林業》（高雄）6（1937年12月），頁41。

<sup>21</sup> 藤森狂花，〈竹山の竹の由來〉，《臺法月報》（臺北）27: 12（1929年12月），頁111。

<sup>22</sup> 當地在乾隆年間出現大規模漢人入墾，這些移民多來自福建漳州南靖、漳浦，請參閱黃素真，〈業戶

代表性物產有一定關聯。也就是說，林圯埔地區竹林產業發展的歷史，其實反映的是漢人移民改造林圯埔沿山地區原始山林地貌的歷程。

漢人在林圯埔地區從事較具規模的農業拓墾，大約是在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間。根據相關研究指出，林圯埔地區原屬阿里山番（今北鄒與布農卓社番）與水沙連番（今邵族）的生活領域。18 世紀中葉，由於臺灣西部平原人口壓力增加，迫使漢人遷往淺山丘陵地帶，而林圯埔地區大規模的拓墾也在此時發生。這些漢人勢力透過武力及非武力的形式進行開墾，前者有軍工匠、隘番的隘墾；後者為通事、勢豪以「番食租」交換土地。基本上，嘉慶年間林圯埔當地的土地拓墾已經達到飽和，但由於利益及生計考量，漢人拓墾活動只能再往東邊的內山推進，不斷越界私墾。<sup>23</sup> 上述研究成果與林圯埔地區漢人移民發展竹林產業的歷史吻合。

那麼，漢人為何大規模種植竹林，改造林圯埔沿山自然地景？此舉措恐怕與竹林成為交易商品，也就是竹林的商品化有一定程度的關聯。在林圯埔地區不僅存在買賣田園的土地交易，其實還有竹林買賣的類型，翔實地呈現在契約紀錄上。〈乾隆 59 年黃冊立永賣盡根契〉是目前最早關於林圯埔地區竹林買賣的契約文書。<sup>24</sup> 根據契文所示，黃冊所要出售的是位在泉州寮後崁腳（今竹山鎮福興里）「自己栽種有籐竹林壹所」，這份契約並未明確記載面積，只標示四周界址為「東至崁，南至路，西至園，北至林家竹林」，顯示除黃冊家以外，北邊接臨的林家亦擁有竹林。此外，契約內容也僅指該片竹林「苞數不計」。<sup>25</sup> 在文書中黃冊特別強調「其銀即日同中交收足訖，其籐竹林隨即踏明界址付銀主前去掌管，永遠為業，任從砍伐變賣，不敢阻擋」，直接顯示竹林在當時已是可以銀貨兩訖的買賣商品。這意味著，18 世紀末以來林圯埔地區的竹林逐漸脫離自然原始林相而成為交易標的，甚至可以透過人為栽植持續產出竹材，成為當地山林經濟活動中重要的交易項目。<sup>26</sup>

許廷瑄與林圯埔大坪頂地區的拓墾發展》，《臺灣文獻》（南投）56:4（2005 年 12 月），頁 23-89。

<sup>23</sup> 有關林圯埔地區拓墾過程及族群關係的討論，請參閱莊英章，《林圯埔：一個臺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頁 26-41；洪麗完，〈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臺灣史研究》18:1（2011 年 3 月），頁 41-102；洪麗完，〈清代臺灣邊區社會秩序之考察：以濁水溪、烏溪中游之「亢五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0:4（2013 年 12 月），頁 1-50。

<sup>24</sup> 引自林漢梁編著，《竹山林業史誌》（南投：頂林林業生產合作社，2000），頁 30。

<sup>25</sup> 「苞」就是竹林的量詞，有時也作「抱」（phō）。

<sup>26</sup> 在林圯埔地區現存的文獻中，留下不少關於竹林買賣的契約，具體說明此事。除了最早訂立於乾隆

表1 1874年（同治13年）二城陳文梓等五房第一次鬮產

鬮分次序	鬮產內容
一鬮文通	紅兄田下茶園至巔仔尾一所；二突仔貓兒竹林；頂城祖師公會一陣
二鬮文軒	大岸頂茶園二埕；二突貓兒、茶園一所；石城祖師公會一陣
三鬮文梓	西坪茶園至柏仔一所；溪坪貓兒、桂竹、蕨竹一所；二城福德會一陣
四鬮阿亨	大路頂茶園至柏仔一所；二突貓兒竹、橫屏頭貓兒竹一所；二城福德會一陣
五鬮文福	大碑寮后西坪茶園一所；二突大片貓兒竹一所；頂城祖師公會一陣
長孫	大碑寮后西坪茶園一所，待雙親百歲以後交付長孫掌管
其他	餘公數借項與牛隻10隻交付雙親掌管

資料來源：引自黃素真，〈由地方現存史料談清代大坪頂（鹿谷鄉）的茶業發展〉，頁163。

隨著竹林產業邁向商品化後，林圯埔地區也普遍投入竹材的種植與生產，並成為當地家族重要的產業。根據表1整理自1874年二城（今鹿谷鄉鳳凰村）陳家五房兄弟分產的鬮書可見，茶園與竹林為各房子孫主要取得的產業項目，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可供稻作農業生產的地目。事實上，鹿谷當地因山嶺深谷遍布，除了少數且面積不大的河階面可供糧食生產外，大多數的坡地等邊際土地被漢人利用來種植茶樹、竹林等經濟作物。<sup>27</sup>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想像，19世紀林圯埔沿山地帶普遍出現的地景就是竹林及茶園。值得注意的是，陳家的分產鬮書中並非以「竹林」作為籠統的紀錄，而是將竹林至少細分為貓兒竹林、桂竹林、蕨竹林這幾種竹類，顯示當時人們認為不同竹類的用途有別，經濟價值亦有所差異，於是在書寫契約時會特別強調竹類差異。

20世紀初期，林圯埔的淺山丘陵地帶無疑是全臺規模最大的竹材產地。1908年（明治41年）2月，三菱製紙株式會社經理植田豐橘與技士佐久間隆來臺從事一個多月的竹林調查，在臺灣總督府給出的概算資料中，指出全島竹林總面積超過14,880甲，在這之中竹林最豐富是嘉義、斗六兩廳的阿里山山脈西側地帶，占了全臺竹林面積的一半以上，特別是林圯埔在內的清水溪沿岸，面積約有6,370甲。<sup>28</sup>

59年的契約之外，多為嘉慶朝以後的文書，顯示19世紀以來竹林已成為當地重要的買賣標的，請參閱林漢梁編著，《竹山林業史誌》，頁70-93。此外，張永楨亦透過古文書討論清代竹山、鹿谷的竹林種植情形，請參閱張永楨，〈清代竹山、鹿谷地區的農作經營：以古文書和文獻互相印證〉，頁39-73。

<sup>27</sup> 黃素真，〈由地方現存史料談清代大坪頂（鹿谷鄉）的茶業發展〉，《臺灣文獻》62: 2（2011年6月），頁145-179。

<sup>28</sup> 三菱製紙株式會社社史委員會編，《三菱製紙六十年史：1898-1958》，頁140。



1913 年（大正 2 年）臺灣總督府的調查資料更具體顯示，林圯埔沿山地帶的竹林面積計有 6,911.45 甲。<sup>29</sup> 當地仰賴販竹維生者有六百餘戶、五千多人，此外阿里山脈西側地帶，從事製造竹紙、乾筍為業的家戶，計有一千戶、七千人。<sup>30</sup> 從清代至日治以來，林圯埔當地竹林產業持續且高度發展，讓我們對於此地中低海拔山區竹林遍布留下深刻印象，彷彿認為竹林是此地自然生長而不假人工的天然產物。

## （二）竹材的商品用途

基本上，林圯埔地區高度發展的竹林產業，可以分成二大類：一為竹材的販售，一為製造竹紙及筍乾。首先在竹材的販售方面，依據《雲林縣採訪冊》的記載：「大人嶼山：筍竹成林，樟樹茂盛。沿山多置紙寮、腦灶，以為製紙、熬腦丁役住宿之所。鳳凰山：所產大竹，可以編筏、蓋屋、製紙；筍則製以為脯，民賴其利。小半天山：所產貓兒筍、蔴竹筍，為居民之利」。<sup>31</sup> 該引文中筍竹即桂竹，因為具纖維細、韌性好的特點，多被用來作為造紙的原料，亦被用來製作傢俱。《彰化縣志》記載：「筍竹，有大小二種，大者茅屋取以為桷，小者用以編籬，產於水沙連」。<sup>32</sup> 所以桂竹也被利用在屋樑上作為承受茅草的建材，或作為籬笆柵欄使用。至於所謂的「大竹」則是蔴竹的別稱，因其高大且直徑較粗而得名。《彰化縣志》的描述，將大竹竹稈粗大的特徵具體展現：「大竹，產內山，皮薄而腹大，空一節可作水桶一擔」。<sup>33</sup> 臺灣民間一般依據不同生長年份的蔴竹，而有不同用途。清末鹿谷出生的秀才黃錫三所撰〈蔴竹紀畧〉中就有以下的敘述：

沙連東南諸山，產蔴竹，節直幹，茂密成林，長數尋，圍大二三尺，亦名大竹。一二年者質輕，宜編筏。三四年者，幹老質堅，宜棟樑。歲出萬本，資南部沿海漁筏。隆冬伐為棟樑，不蛀；架屋，可支三十年。<sup>34</sup>

<sup>29</sup> 〈濁水溪流域保安林調查復命書（古川良雄）〉（1913 年 10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5676001。

<sup>30</sup> 〈三菱と竹林事件〉，收於泉風浪，《臺灣の民族運動》（臺中：臺灣圖書印刷合資會社，1928），頁 204-205。

<sup>31</sup> 倪贊元纂輯、張光前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雲林縣採訪冊》，頁 147-149。

<sup>32</sup> 周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彰化縣志》，下冊，頁 476。

<sup>33</sup> 周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彰化縣志》，下冊，頁 476。

<sup>34</sup> 黃允哲主編，《鹿谷黃錫三秀才文集》（南投：南投縣彬彬社文化發展協會，2019），頁 77。

由引文可見蔴竹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不僅廣泛被運用在房屋建材上，同時也大量被用來製造臺灣沿海漁業活動的竹筏。特別是西南沿海地區，如 1905 年（明治 38 年）《臺灣日日新報》所記載：「臺南之竹筏最有名者，為水沙連竹之竹筏。……然以水沙連之竹製之，較對岸之竹筏，其利濟沿岸往來行旅，尤為過之無不及也」。<sup>35</sup> 事實上，運用水沙連所產大竹製筏的不只盛行於臺灣西南沿海，西部濱海漁村亦多可見。文人連雅堂在其編寫的《臺灣通史》提到：「水沙連之竹，徑大至尺餘，縛以為筏，可渡大洋，凌濤不沒，故沿海捕漁皆用之」。<sup>36</sup> 此外，方志中還有記載一種產於水沙連的空涵竹，因其「腹空而大，各邑漁人取以駕筏」。<sup>37</sup> 這些紀錄都強調林圯埔地區出產的竹材中，有一種是直徑較其他竹類寬大的，特別適合用於製造近海漁業使用的竹筏，受到西部沿海的漁民親睽，因而成為林圯埔竹材輸出的代表。

竹材由林圯埔輸出後，民間多依據竹材種類的特性，將其製成各類用品。舉例而言，像是貓兒竹，也就是孟宗竹，主要被利用於下列層面：第一是建築，如竹壁、竹門、屋頂、籬笆等；第二是家具，如竹床、竹桌、竹椅等；第三作為農具，像是整地或耕耘用的竹耙、刈耙，灌溉用的竹製水車、水管；第四是用於包裝農產品的籠，如米籠、番薯籠、土豆籠、菜籠等。<sup>38</sup> 這些貓兒竹的竹製品，可以說橫跨日常生活到農業生產，具體展現竹製品對於臺灣社會生活的影響。其實，各類竹製品還不單純只有上述用途，可以說臺灣日常生活各個層面皆可見其蹤

<sup>35</sup> 〈臺南之竹筏〉，《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11 月 10 日，第 4 版。在 1905 年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報告中就有指出，林圯埔等地出產的竹材是製作竹筏最好的來源。此外，日本民俗學者國分直一於 1941 年（昭和 16 年）針對南臺灣的竹筏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也特別指出林圯埔地區的竹材，自古聞名，是製作近海漁業用的竹筏最佳的材料。請參閱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第二部 調查經濟資料報告》（臺北：該會，1905），下卷，頁 328；〈南台湾の竹筏〉，收於國分直一，《台湾の民俗》（東京：岩崎美術社，1968），頁 286。

<sup>36</sup>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128 種，1962；1921 年原刊），頁 645。林圯埔地區的竹材直到日治初期仍為西部沿海製造竹筏的取料來源，沿海商人甚至前赴林圯埔山區購回販售，請參閱〈編筏〉，《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12 月 9 日，第 4 版；〈林圯埔產業〉，《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7 月 22 日，第 3 版。

<sup>37</sup> 周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彰化縣志》，下冊，頁 476。

<sup>38</sup> 臺灣民間使用竹材製作的農具種類頗多，請參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臺灣之農具》（臺北：該局，1921）。另外，關於竹材的運用在日常生活層面的討論，可參閱王子定、郭寶章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之竹林與竹材》，頁 100-102。



影，從而造就竹材具重要的商品價值。<sup>39</sup> 換言之，竹材之所以富有商品價值，是因為竹材可以透過加工，製成多樣化的生活用具及生產工具，提供不同層面的市場需求。

其次是竹紙及筍乾生產。清代臺灣的紙製品主要從福建進口，但臺灣本地亦有發展造紙產業，惟規模不大。清代臺灣造紙主要取材自富含大量纖維的竹子，其中林圯埔地區即是竹紙產地之一。關於臺灣製造竹紙的紀錄，最早可見於翰林院庶吉士陳壽祺所纂輯《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中所記：「沙連紙，以沙連之竹製之」。<sup>40</sup> 「沙連紙」指的應該是以沙連保所產竹材製成的紙。誠如前述，清代林圯埔淺山丘陵地帶是竹林所在，生產桂竹、蔴竹、貓兒竹等竹材。這些竹材因為尺寸長且質量重的特性，不易透過陸路搬運，於是在林圯埔地區產竹的沿山村落，便發展出將竹材加工製造成竹紙的產業。一般而言，這些村落以桂竹、蔴竹加工製成粗紙，再依照質地及厚薄至少區分為九種等級，其中質地最佳的是名為「白皮」的精製紙，專門用於書寫及包裝質量輕巧的物品，次之則用作藥材、糕餅等的包裝紙，較差的則作為祭祀使用的金銀紙錢。<sup>41</sup> 笨重的竹材在產地加工之後，做成較輕的竹紙，確實有利於商品的流通。當地居民通常會將竹紙挑運到林圯埔街的紙行販售，再由紙行發售到濁水溪下游的北斗街等中大型市街。<sup>42</sup>

竹筍作為竹子的副產品，亦是竹林產業具經濟價值的重要組成元素。清代林圯埔沿山地區出產筍乾，是當地重要的物產代表，多採人工挑運至鹿港販售。<sup>43</sup> 1911 年（明治 44 年）林圯埔支廳的調查顯示，其轄區筍子的產額每年約有 126 萬斤，以蔴竹筍的產量最高，約為孟宗筍（貓兒竹筍）產量的兩倍。蔴竹筍主要以筍乾的形態銷售，地方居民會在蔴竹林搭設筍寮，並利用燒炭的窯來加工筍乾。筍乾在林圯埔當地的市場價格約為每百斤 15 元左右，主要銷往鹿港，再外銷到

<sup>39</sup> 在清代到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不僅漢人生活仰賴竹材，原住民亦是如此，相關討論請參閱永山規矩雄，〈臺灣に於ける竹材利用の概要〉，《臺灣の山林》（臺北）81（1932 年 12 月），頁 59-79；王子定、郭寶章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之竹林與竹材》，頁 97-108。

<sup>40</sup> 陳壽祺總纂、洪燕梅點校，《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上冊，頁 322。

<sup>41</sup>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本島製紙業調查書》（臺北：該局，1909），頁 1-2。

<sup>42</sup>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本島製紙業調查書》，頁 70。

<sup>43</sup> 不著撰者，〈鹿港風俗一斑〉（1896，未刊本），無頁碼。

中國，一部分則運往彰化及臺南等地區供給內銷。<sup>44</sup> 例如鹿港謙和號許志湖家族在乙未戰役時暫避福建泉州期間，就曾在書信中要求住在臺灣的家人寄送筍乾到泉州。<sup>45</sup> 至於孟宗筍因產出最早且風味佳而市場需求大，其中以每年 10 月至翌年 1 月出產的「冬筍」價格最好，每百斤約 5、6 元，甚至 7、8 元，有時還可以達到 13、14 元的高價。<sup>46</sup>

整體而言，竹材因具備多元用途及售價低廉的特性，被廣泛運於生活各個層面，是臺灣庶民日常普遍且重要的用材。其中，林圯埔沿山地帶作為臺灣重要的竹林產地，在市場需求的推動之下，當地逐步發展出竹材販售、竹紙製造等竹林產業，成為 19 世紀以來臺灣中部山林經濟的具體展現。

### 三、「放排」（pàng-pâi）：竹材的水上流通

林圯埔沿山地帶是重要的竹林產地，當地發展出竹材主要的兩種銷售方式：一是竹排放流，一是竹紙製造，尤其以竹排放流最為大宗。

首先，在竹排放流方面，主要仰賴於流經林圯埔沿山地區的濁水溪及清水溪水運。濁水溪具有水力運輸的價值，最遲在 18 世紀就已經被開發利用。今日南投縣名間鄉濁水村存世的 1765 年（乾隆 30 年）〈嚴禁軍工料件阻滯圳道碑記〉，其文字記載水沙連大坪頂（今南投縣鹿谷鄉）<sup>47</sup> 所產的樟木是供給官府造船的軍工料來源，但由於通土、埤甲顧忌木料放流施厝圳（也稱八保圳）容易導致圳道損壞，而出面阻擋，最後由臺灣道蔣允焄立碑示禁，並要求「凡運放軍工料件，務須照舊從大溪放運，……照舊由溪放運，直運海口」。<sup>48</sup> 此處所言「大溪」即

<sup>44</sup> 〈濁水溪流域保安林調查復命書（古川良雄）〉（1913 年 10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5676001。

<sup>45</sup> 林玉茹、劉序楓編，《鹿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陸的貿易文書（1895-189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6），頁 54。

<sup>46</sup> 〈濁水溪流域保安林調查復命書（古川良雄）〉（1913 年 10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5676001。

<sup>47</sup> 「大坪頂」為今南投縣鹿谷鎮的舊稱。清代漢人墾拓「大坪頂」地區，先後成立初鄉、坪仔頂、新寮街、車軌寮、羌仔寮、小半天、內樹皮等村莊，俗稱「大坪頂七庄」，請參閱黃素真，〈業戶許廷瑄與林圯埔大坪頂地區的拓墾發展〉，頁 26-28。

<sup>48</sup> 〈嚴禁軍工料件阻滯圳道碑記〉，收於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

指濁水溪。濁水溪發源自合歡山佐久間鞍部 3,200 公尺的高山，是全臺灣最長且流域面積最廣的河流，其範圍涵蓋今彰化、雲林、南投三縣。<sup>49</sup> 濁水溪由群山之中流出，至八卦臺地與觸口山臺地交會處，開始進入濁水溪沖積扇平原，自此分成五條放射狀的溪流，由北而南依序為東螺溪（舊濁水溪，下游為麥嶼厝溪）、西螺溪、新虎尾溪、舊虎尾溪及虎尾溪（下游為北港溪）。<sup>50</sup> 濁水溪以廣闊的沖積扇平原為腹地，特別是隨著 18 世紀流域周緣聚落的成立，其在重山峻嶺與平原間作為主要物資流通與交通運輸通道的重要意義進一步顯露出來，對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變遷產生了深刻影響。

除了水師修造船隻用的軍工料限制由濁水溪放流之外，清代林圯埔的竹材流通也受到官府的規範。嘉慶年間發生海盜蔡牽事件（1795-1810），官府為了防止臺灣本地所產竹材遭到海盜奪取而製成船筏器具，於是明令管控竹竿在沿海地區的流通。在〈臺地後山請開舊禁摺〉中記載：「臺產竹竿，向因洋面不靖，恐大竹篷筏有關濟匪禁出口，以致民間竹竿經過口岸均需稽查」。<sup>51</sup> 官府雖然對竹材實施管控，卻未禁止民間流通。而林圯埔竹材輸出頻繁的結果，被負責海口稽查工作的汛兵及書役視為有利可圖，遂對竹販進行勒索。1816 年（嘉慶 21 年）3 月，彰化縣民劉東山從水沙連沿虎尾溪放運竹材至笨港地方汛口通驗時，遭受汛兵勒索，「逆抽為規例，每枝竹勒索銅錢貳拾叁文」。而且汛兵勒索竹販之事陸續發生，受到臺灣鎮總兵武隆阿的重視，遂於今嘉義東石港口宮立碑示禁。<sup>52</sup> 由此可知，至遲在 19 世紀初葉，林圯埔沿山地帶的竹材已利用溪流的水力輸運沿海販售。

清代林圯埔的竹材得以大規模的運出，完全仰賴濁水溪及清水溪的水力資源支持，從而發展出竹排放流的專業化產業，並在官府政策的調整下持續發展。今日竹山、鹿谷地區最重要的媽祖信仰中心連興宮，廟內豎立著 1824 年〈嚴禁勒

---

頁 201-202。

<sup>49</sup> 張素玢，《濁水溪三百年：歷史、社會、環境》（新北：衛城出版社，2014），頁 28。

<sup>50</sup> 陳正祥，《臺灣地誌》（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3），中冊，頁 832。

<sup>51</sup> 〈臺地後山請開舊禁摺〉，收於沈葆楨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臺灣奏摺》（文叢第 29 種，1959），頁 13。

<sup>52</sup> 〈汛口陋規示禁碑記〉，收於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縣市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頁 34-35。

索竹排船伏碑〉記載：「沙連保民附山居住，生產竹木縛結成排，由清、濁兩溪僦運出售」，<sup>53</sup> 具體說明沙連保產出竹材，當地居民通常會將一定數量的竹材捆綁成竹排，再將竹排透過清水及濁水兩溪的水力，運送到外地販售。而牡丹社事件之後，官府施行「開山撫番」政策撤除番界禁令，更加擴大竹材的伐採範圍。1875年（光緒元年）〈私入番境撤禁告示碑〉中即載：「臺地所產大小竹竿以及打造農器等項生熟鐵斤，均聽民間販運。……如所轄文武汛口員弁、兵役及通事、匠首人等仍有藉端扣留勒索情事，官則撤參，兵役、通事、匠首即立提究辦，決不姑寬」。<sup>54</sup> 由於番界管制的鬆綁，一方面取消了軍工匠首獨佔山林資源的特權，促使民間的竹林產業經營得以擴展；另一方面，竹排放流至海口也無須再受到官兵稽查，物流更加通暢。這一趨勢使得林圯埔沿山的竹林產業持續興盛，誠如前述，該地在清末已經發展成為臺灣中部最主要的竹材產地。

清代林圯埔地區產出的竹材仰賴濁水溪及清水溪的水力進行輸出，這一水上流通的型態，福佬話稱「放排」（pàng-pâi），也稱「放竹仔」（pàng-tek-á）或「放竹排」（pàng-tek-pâi）。一般而言，當地竹農會先衡量溪水水量多寡，再將長短、大小一致的竹材綜橫連結成竹排，通常採5束乃至7束，然後將竹排像火車車廂般頭尾連結，做成10連結乃至15連結，以一人能操作的程度作為竹排組合的原則，進行竹材流通。<sup>55</sup> 日本建築學者青井哲人的研究指出，濁水溪、曾文溪、二仁溪這三條溪流，<sup>56</sup> 曾經是臺灣西部平原「放竹仔」的重要場域，並在河流下游地帶形成專門的竹材市場，是沿海漁村房屋建材、竹筏及蚵棚等取材的主要來源，而在此三條溪流「放竹仔」的經濟活動，最遲於1960年代左右就不再進行。<sup>57</sup>

林圯埔沿山地區以水力輸運竹材的方式，主要集中在清水溪及清水溝溪流域，<sup>58</sup>

<sup>53</sup> 〈嚴禁勒索竹筏錢文示禁碑〉，收於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頁140-141。

<sup>54</sup> 〈私入番境撤禁告示碑〉，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文叢第151種，1962），頁114。

<sup>55</sup> 〈濁水溪流域保安林調查復命書（古川良雄）〉（1913年10月1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5676001。

<sup>56</sup> 關於「放竹仔」的經濟活動應不只存在此三條溪流，筆者田野的過程中，亦曾聽聞大甲溪及八掌溪曾有「放竹仔」，惟未見相關研究，仍待日後進一步探討。

<sup>57</sup> 青井哲人著，張亭菲、楊朝傑譯，〈以竹為特色的市鎮：臺灣濁水溪流域的內陸河港市鎮群與竹造街屋的歷史意義〉，《建築學報》（臺北）104（2018年6月），頁117。

<sup>58</sup> 清水溝溪又稱南清水溪，是濁水溪的小支流，全長17.55公里，主要流經今南投縣鹿谷鄉瑞田村、清

尤其以清水溝溪的蔴竹林、小半天（今鹿谷鄉境）的孟宗竹及勞水坑（今竹山鎮境）的桂竹為大宗。<sup>59</sup> 竹農一般在砍伐竹林之後，會僱用大量人力將竹材拖運到河床附近集中堆放，接著依據長短粗細連結成竹排，最終由人工操縱運輸至平原及海口販售。當地也因為人力頻繁拖運竹材，而留下「拖竹路」的地名，<sup>60</sup> 甚至今日清水溪畔的泉州寮（今竹山鎮福興里）聚落通往河床的石造階梯上，仍留存因長期拖運竹材所刮鑿的遺痕，都具體印證竹材仰賴水上運輸的歷史。

竹材由林圯埔山區往沿海輸運的過程，實為高風險的產業活動。一般而言，排夫因為長時間以立姿操控竹排，相當耗費體力，而且需要熟悉濁水溪水路及深諳水性，通常由清、濁水溪沿岸的男性居民擔任。放排的過程中，排夫也要留意河道走勢，若不慎撞上溪灘或石頭即會招致「敗排」（pāi-pāi）的危險，頃刻竹材因衝撞而飛散，排夫要機警跳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所以人力操控放流竹材的風險本就不小。<sup>61</sup>

此外，勒索事件頻發亦是竹材放流的風險之一。19 世紀中葉，濁水溪中、下游地帶，因為竹販遭遇勒索事件接連發生，於是官府在處置之後陸續於林圯埔街及西螺街設立示禁碑。首先是 1824 年由彰化知縣李振青所頒的〈嚴禁勒索竹排船伏碑〉，立石在林圯埔的連興宮三川殿。碑文大意是林圯埔沿山居民以清、濁水溪販運竹材至西部沿海銷售獲利。濁水溪南岸溪洲（今雲林縣林內、荊桐鄉）是竹排放流必經之地，當地張姓居民仗勢欺人，凡是竹排經林內觸口來到溪洲一帶時，他們便會趨前向排夫勒索錢文，造成「排夫劉承行、莊先進、黃克明等被索不甘，紛紛呈稟，彼此挾有嫌隙」。1823 年（道光 3 年）7 月，劉承行僱請張受與等人協助押運竹排，以防不虞，卻被斗六門汛守備誤以為是勒索罪犯而被捉拿。後來在沙連保總理林永等人出面協商之下，議定以每一竹排抽收貳百文錢，作為沙連林圯埔天后宮（今竹山鎮連興宮）及溪洲元帥廟（今荊桐鄉仁和宮謝府

水村、秀峰村、永隆村、鳳凰村。林文燦總編纂，《鹿谷鄉志》（南投：鹿谷鄉公所，2009），頁 174。

<sup>59</sup> 〈濁水溪流域保安林調查復命書（古川良雄）〉（1913 年 10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5676001。

<sup>60</sup> 〈道光 22 年劉清發立認墾界字〉，《林泗達等排下竹林糾紛》，「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檔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藏），檔號：0039/316.1/1/01/0001/012。

<sup>61</sup> 〈清水溪竹排放流〉，收於塗有忠主編，《下崁采風錄》（南投：南投縣竹山鎮中和國民小學，1997），頁 238-241。

元帥廟)的香燈諸費。<sup>62</sup> 其次是立於1827年(道光7年)由彰化知縣李廷璧所立〈嚴禁破埤害課碑記〉。碑文記載西螺保業戶聯名向彰化知縣申訴,供稱豪強張姓在濁水溪溪頭等處截索排費,「只要筏夫多錢,即行破埤放筏」,破壞攔水的石笱,致使鹿場圳圳水別流而造成稻苗枯萎,衝擊政府稅收,雖然由官府多次示禁,但竹排勒索事件卻未能滅除。<sup>63</sup> 此外,道光年間姚瑩(1785-1853)的《東溟奏稿》亦收錄:「陳勇、黃馬均係彰化縣人,……,把截濁水溪,抽取載貨竹筏錢文。……陳勇佔住觸口」。<sup>64</sup>

這些勒索事件的發生地點為「觸口」或作「觸口溪州」,大致來說就是濁水溪由山區進入沖積扇平原的開端,水勢逐漸和緩,河道也由石礫轉化為砂土,漫流於沙洲之上,意味著自然地形對於排夫的挑戰逐漸減小。同時,這裡也是前述鹿場圳的取水口,放排活動甚至可能利用部分圳道放流竹材。<sup>65</sup> 總之,觸口一帶猶如門戶,是山區進到平原的必經之處,特別是當地遠離縣城,乃為搶劫、勒索等事件好發之地,可說是治安死角。有意思的是,上述竹排勒索事件頻發於道光年間,其實也是臺灣西部沿海環境變動劇烈的時期,港道淤塞與海岸陸化等自然變遷,致使竹筏運輸及養蠟產業興盛,竹材需求因此提升,帶動了林圯埔竹材水上流通的興盛。

雖然竹材放流具有高度風險,但從清代開始就是林圯埔沿山居民重要的獲利來源,吸引當地家族投資,大坪頂林德好(1803-1871)就是一例。根據〈渡臺祖林灶公渡臺誌〉的記載,林灶家族的第三代林德好,經營小半天一帶的大竹買賣,

<sup>62</sup> 〈嚴禁勒索竹排船伏碑〉,收於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頁140-141。既有研究多以碑文所記「東螺一帶」及「溪洲元帥廟」,認定該廟位在今彰化縣溪州鄉,但皆無法確實指出該廟所在。筆者在田野調查時發現溪洲元帥廟應為雲林縣莿桐鄉六合村的仁和宮,該廟因供奉謝府元帥,亦稱謝府元帥廟。當地鄰近八卦臺地與斗六丘陵交接的觸口,又因地處西螺溪與虎尾溪間的漫流地帶,沙洲廣布,即為碑文所載「觸口溪洲」地帶。最初行政區上屬彰化縣東螺保所轄,1887年(光緒13年)成立溪洲保劃歸雲林縣。在住民方面,張姓為當地大姓,分布於西螺溪南岸臨河成庄,並於1830年(道光10年)11月成立慶餘堂張八房公的組織,統合竹園仔、石榴班(以上屬今雲林縣斗六市)、九芎林(今雲林縣林內鄉)、新庄(今雲林縣莿桐鄉)等庄的張姓。由上可知,溪洲元帥廟應為西螺溪南岸的仁和宮。

<sup>63</sup> 〈嚴禁破埤害課碑記〉,收於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頁31-32。

<sup>64</sup> 〈勒平彰化縣逆匪奏〉,收於姚瑩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東溟奏稿》(文叢第49種,1959),頁158。

<sup>65</sup> 由於濁水溪歷經數次氾濫、改道,究竟放排活動何段水路運用圳路已不可考,惟臺南知府唐贊袞的《臺陽見聞錄》收錄竹費一項中,記載「埤工費約貼五百餘千文」,應是放排活動運用圳道的補貼,有關竹費詳本節討論。

在坪仔頂（今鹿谷鄉秀峰村）宗親引介之下，成為府城行郊的主要竹材供應商。當時林德好單獨操控竹材出海，由濁水溪水路接到沿海，最後運抵府城販售，一切食宿皆在竹排上完成。由於販竹至海口獲利頗豐，回程走陸路時總擔心匪徒覬覦財物，經常提心吊膽。<sup>66</sup> 此外，日治時期曾任羌仔寮區長的林邦光（1874-1949），在其生平記事中陳述，他與親戚共同於大坪頂經營雜貨及喪事用品的「採白」生理，經營兩年後決定改途：「將資金漸集，傾買大竹。至年末，共買三枝圍之額，每枝圍約三百六十枝，至辦出海資金集有千餘圓，擬由四叔隨竹出海口而兌之。……兩人內議謂此竹賣完必要將金集齊帶還，以便相機而動」。<sup>67</sup> 由上述兩個家族實例，說明林圯埔山村居民認為經營大竹銷往沿海地帶販售，是可以快速累積資產的辦法。

事實上，臺灣總督府的調查報告也記載，若能順利將竹材放流至海口，則賣價即可以倍增。如 1913 年林圯埔當地蔴竹依等級粗分為大班、二班及三班，市場價格分別為 2 円 50 錢、2 円、1 円 50 錢，不過到了安平、東港、東石等海口，價格就會增加為 5-6 円。<sup>68</sup> 雖然經營竹材水上流通具有一定風險，但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逐漸發展成為當地的重要維生產業。除了上述清水溝溪沿岸的家族實例外，清水流域的福興、鯉魚尾、山坪頂、勞水坑、桶頭及田仔地區（皆屬竹山鎮），靠著搬出、販售這一專業維生的居民也有六百餘戶、五千多人，<sup>69</sup> 由此可見林圯埔沿山地帶竹材水上流通的蓬勃景象。

林圯埔山區水運放流竹材是以「流」作為流通單位，同時也是民間與官府抽收竹材流通規費的計算單位。根據 1891 年（光緒 17 年），臺南知府唐贊袞《臺陽見聞錄》中記載竹費一項：

查雲林縣屬清、濁兩溪向有私抽竹費，去年六月間業經李令聯珪稟歸公收，改為官辦，估量每年可抽二千餘串，內除局紳飯食等項約共六百餘千文，

<sup>66</sup> 〈渡臺祖林灶公渡臺誌〉，收於林石陣編修，《平和林灶公渡臺誌暨族譜》（南投：林灶公祭祀公業，1978），頁 139。

<sup>67</sup> 請參閱林邦光親筆，〈林邦光生平記事〉（不著年月，未刊本，林惠朗收藏，林宜敬提供）。

<sup>68</sup> 〈濁水河流域保安林調查復命書（古川良雄）〉（1913 年 10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5676001。

<sup>69</sup> 〈三菱と竹林事件〉，頁 204-205。



又收埤工費約貼五百餘千文，除外贏餘千串征存款目，歸於廟宇書院工程撥用，稟准試辦在案。……該縣內山一帶種竹，為出產甚多，向來載運大竹出口，一百二十枝為一溜，次者一百七十枝為一溜，小竹四、五百枝為一溜；全年核計，竹枝販運出口，實屬不少。現廖從九稟請將竹費改為竹稅，歸於稅釐項下，……，估計該處販運竹枝出口者，全年約有六、七百溜，仍照現辦章程，每溜征完釐金銀六元三角三瓣六尖，每年計可征餉銀四千餘元。<sup>7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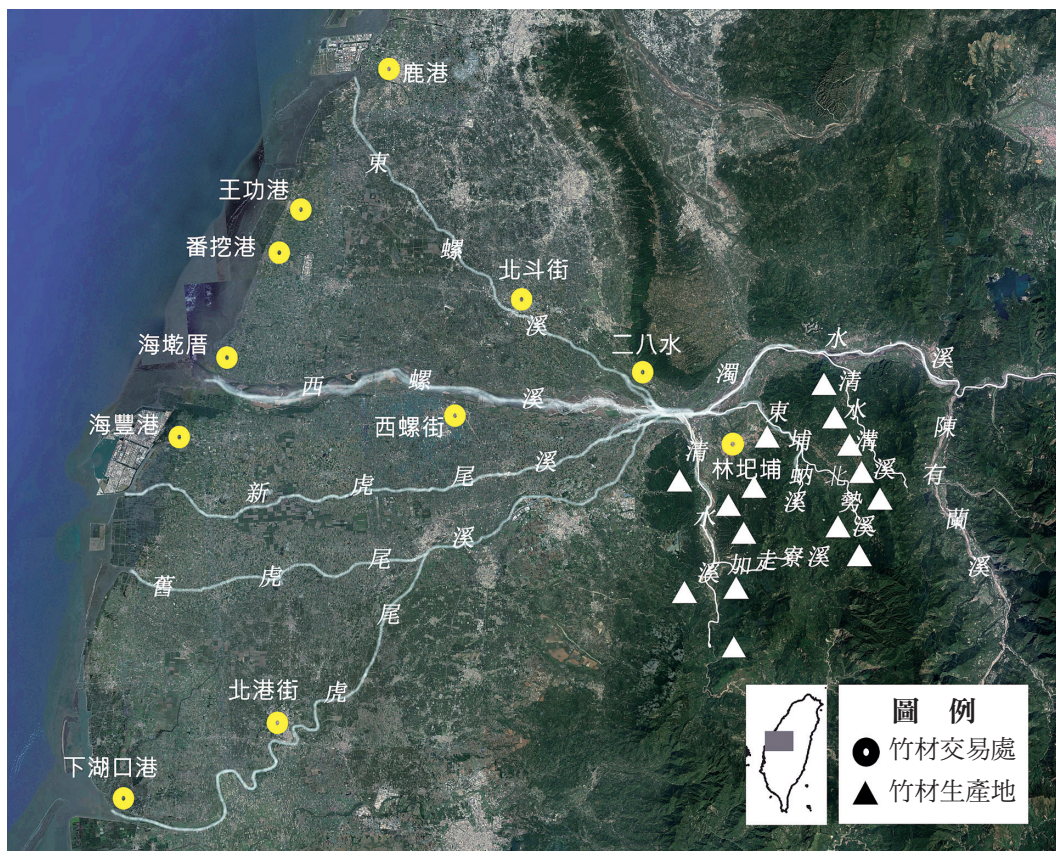


圖2 竹排放流河道與重要竹材交易街庄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改繪自 Google Earth。

<sup>70</sup> 唐贊袞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陽見聞錄》（文叢第30種，1958；1891年原刊），頁70-71。



由引文可知，清代林圯埔當地俗例就放流竹材抽收竹費，至1890年（光緒16年）雲林縣知縣李聯珪向上級建議將竹費收歸官辦，並展開為期一年的試辦。翌年（1891）則在廖從九稟請之後，原本由民間抽收的竹費正式收歸官方辦理，竹稅也成為稅釐其中一個項目。當時林圯埔新置竹稅局並由地方頭人擔任，如林月汀（1870-1931）就曾以「賞戴藍翎欽加五品銜沙、鯉兩堡聯甲分局兼辦竹稅局辦理」的身分參與竹稅局的經營。<sup>71</sup> 在竹稅局經費的運用方面，早期抽取竹費作為香燈資費，用以維繫地方廟宇運作；歸公後的竹稅則作為廟宇、書院工程及維修埤圳等開銷。<sup>72</sup> 基本上，竹費與竹稅用途相當，大多運用於地方公共事務。

關於竹稅或竹材售賣以「流」作為流通單位的原由，與竹材的水上流通型態有關。誠如前述，林圯埔地區竹材因採網綁且頭尾銜接成若干列的放流方式，從而發展出特殊的計數單位，也就是前舉引文中所謂的「溜」，亦作「流」。基本上，「一流」的計算是依照竹材直徑的粗細來區分。光緒年間，林圯埔地區「販運竹枝出口者，全年約有六、七百溜」，<sup>73</sup> 若大竹出口120枝為一溜來計算，當地一年可輸出72,000-84,000枝，而小竹以4、500枝為一溜，則可達到240,000-350,000枝。日治時期，林圯埔當地的竹材有了更細緻的尺寸區分（詳如表2），所以「一流」的數量也隨之調整，但基本上計算原則與清代相同，「一流」都是尺寸較細的所含竹枝數量較多，反之，尺寸粗大者所計竹枝總數則較少。在當時林圯埔地區一年可產1,500-2,000流，<sup>74</sup> 也就是8寸大竹一年可輸出810,000-1,080,000枝，3寸小竹則有4,050,000-5,400,000枝。

表 2 日治時期竹材一流的計算方式

尺寸（寸）	數量（枝）	尺寸（寸）	數量（枝）
3	2,700	6	900
4	1,800	7	660
5	1,200	8	540

資料來源：〈三菱と竹林事件〉，頁 214。

<sup>71</sup> 陳鳳儀，《竹山郡管內概要》（1932，未刊本），無頁碼。

<sup>72</sup> 竹山鯉魚尾庄的重興巖（鯉魚尾巖，原稱新興巖）在清代有抽收竹費作為香燈之資。當時居民議定將放流清水溪的竹排，以 5、600 乃至 2000 根算做一流，每流樂捐 50 錢充作經費。後來光緒 17 年（1891）竹稅局成立後，乃改為春秋二季由廟祝向信徒募捐「化緣票」維繫廟宇運作。請參閱劉枝萬，《南投縣風俗志 宗教篇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61），頁 53-54。

<sup>73</sup> 唐贊袞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陽見聞錄》，頁 71。

<sup>74</sup> 〈三菱と竹林事件〉，頁 214。

由林圯埔沿山地區輸出的竹材，在二八水（今彰化縣二水鄉）進行集散之後，分流輸往鹿港、北斗、西螺、北港等中大型街市及港口（如圖2）。二八水地方成為重要竹材集散地的原因，從地理位置來看，此地乃為濁水溪與清水溪匯流之處，即前述觸口地帶，溪流由淺山河谷進入沖積扇平原的開端，水勢平緩，適合竹材靠岸堆放。<sup>75</sup> 同時，此處也是濁水溪流路分散的地方，竹材可以經由東螺溪、西螺溪、新虎尾溪、舊虎尾溪及虎尾溪（下游為北港溪）繼續輸往下游各重要街庄，甚至通往海口港市，例如東螺溪可通北斗街、鹿港，西螺溪可通西螺街，虎尾溪可通北港街（今雲林縣北港鎮）、下湖口港（今雲林縣口湖鄉），甚至繼續往南輸送至府城等西南海岸地區。由於清水溪及濁水溪河道上下連貫，豐沛的水力環境創造出有利於竹材的流通機制。而二八水亦因這一地理優勢，使得當地的商人可以靠著販竹而累積財富，像張老嘆（1889-1944）就是著名的例子。傳聞他年少時以販竹為業，為人誠實且記憶力過人。一回三井商社帳房漏記竹材款項，他主動要求對帳，雖不識字卻能將每批竹材數量及款項一一交代，絲毫無差，自此受到三井商社的青睞，獲得該商社竹山營業所的竹材總經銷權而發跡，最終成為當地的富商。<sup>76</sup>

從二八水集散的竹材，會繼續放流到西北邊的北斗街與西南邊的西螺街這兩大竹材交易市場。這兩處市街是清代鹿港腹地內頗具規模的商業聚落，扮演著農產品集散的角色，許多山、海的物產皆在兩地交易，尤其臨河的緣故，同時也是竹材流通中心。<sup>77</sup> 這些濱臨濁水溪的市街與其周邊發展的農村，對於竹材的需求不小，遂逐漸發展出「放排」這一商業活動。這些市街的商人們多自主前往林圯埔沿山地帶購置竹材，常見的交易型態是賖下整片竹林。像是位在東螺溪下游的崁仔腳聚落（今彰化縣福興鄉三和村），居民在清代經常前往林圯埔山區採購大規模的竹材，再透過東螺溪便捷的水運，將竹材放流至當地。<sup>78</sup> 另一種則由竹農

<sup>75</sup> 三菱製紙株式會社成立後，會社自行經營竹材的伐採及販賣，不許林圯埔地區居民賖耕，並且與二八水地區的商人直接締結賣渡契約，請參閱〈三菱と竹林事件〉，頁213-214。

<sup>76</sup> 〈創建戲院的張老嘆〉，收於蔡炎城，《二水軼聞》（臺北：蔡炎城，1983），頁25-28。

<sup>77</sup> 楊朝傑，〈清代臺灣西螺街的形成與發展〉，《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臺南）9（2015年5月），頁5-39；張素玢等撰稿、張哲郎總編纂，《北斗鎮志》（彰化：北斗鎮公所，1997），頁493-495。

<sup>78</sup> 彰化縣福興鄉公所編，《福興庄原始典誌（增訂三版）》（彰化：彰化縣福興鄉公所，2022），頁305-306。

自行放流，然後自己將竹材拖運上岸，但並非在河床上販售，而是在鄰近市街周緣寬闊的土地上搭建臨時性的建築進行竹材販售，而「竹寮」是最常見的型態。據說北斗當地的竹寮多開設在東螺溪沿岸；<sup>79</sup> 西螺街當地的做法也是從溪流中將竹材拖運上岸之後，再由牛車運送到臨近街道附近搭建竹寮販售，與北斗街的做法並無二致。

林圯埔當地竹材的水上流通，最終抵達彰化西海岸的鹿港。依據鹿港協源號後人丁玉書的回憶錄記載，傳聞清代港底一帶（今鹿港鎮菜園里）開設18家專門販售竹材的竹寮，這些竹販共同崇祀「三光（公）佛」。<sup>80</sup> 雖然「三光佛」的來歷不明，<sup>81</sup> 但透過共同祭祀一事，推測清代竹材販賣業者，可能曾經存在同業組織或神明會。細究港底為何能有18家竹材業者匯聚，應與當地的地理環境有關。清代港底所在的聚落，是鹿港港道最內側的船舶停靠處，距離不遠的虎頭澳（今大明路46巷一帶）也是船隻維修的處所。由於清代船隻修造的材料，主要使用木材與竹材，當地也因此匯聚了大量木料竹材。這些材料，並非只是專供修造船隻，亦可作為庶民生活的建材及日常用品。從港底步行約5分鐘的距離，就可以到達竹篾街（tik-bih-á-kue，今稱德興街）及杉行街。由街名「竹篾」可知，當地主要為竹工藝製作等竹材加工所形成的專業街區。日治時期鹿港街役場的調查顯示，當地竹工藝、家具及線香香腳的竹材，主要來自林圯埔。<sup>82</sup>

其次，關於竹紙製造方面。竹材因為大且長的材料特性，造成搬運困難，於是產地居民發展出將其加工製成竹紙的辦法，以減輕量體面積及重量，如此則有利於挑運販售，並可提高產品價值。前已述及，林圯埔為全臺最大規模的竹材產地，擁有滿山遍野大規模的竹林，當地理應也是全臺最大的竹紙產地，然而事實卻非如此。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進行全臺竹紙製造業的調查指出，嘉義

<sup>79</sup> 張素玢等撰稿、張哲郎總編纂，《北斗鎮志》，頁493-495。

<sup>80</sup> 丁玉書記載港底的18家竹寮，因咸豐年間爆發水災，港口淤塞而關門，以致三光（公）佛無人祭拜。請參閱丁玉書，《勿忘草》（彰化：丁玉書，2006），頁110-111。不過，筆者不認為港口淤塞會造成竹寮全數倒閉，因為今日到鹿港港底當地訪問，仍可聽到當地人講述竹寮經營及竹材放流的情況。參閱楊朝傑訪問、記錄，《許永橙先生訪問紀錄》（2022年7月4日於鹿港許宅，未刊稿）。

<sup>81</sup> 根據丁玉書記載「三光佛」奉祀於中厝黃成發（黃炎興之父）宅，筆者於2022年7月4日前往鹿港中厝黃宅田野，該宅正廳仍供奉「三光佛」。從造像可以判斷「三光佛」應該是「三寶佛」，即由釋迦牟尼佛、藥師佛、阿彌陀佛等三尊佛像組成。至於竹寮業者何以選擇該神祇供奉，則不得而知。

<sup>82</sup> 鹿港街第二公學校編，《鄉土誌》（彰化：該校，1931），頁29。

廳以 250 戶居首位，其次為斗六廳及鹽水港廳各 70 戶，依序是新竹廳 39 戶、臺北廳 9 戶、桃園廳 7 戶、南投廳 3 戶、苗栗廳 2 戶。<sup>83</sup> 這份日治初期的報告，反映出清代以來全臺最大規模的竹紙製造集中於嘉義廳，而林圯埔所在的南投廳並非竹紙的重要產地。而嘉義廳下製造竹紙的產地分布於打貓東頂堡（今雲林縣古坑鄉南部及嘉義縣梅山鄉全部、大林鎮東北部）、大目根堡（今嘉義縣竹崎鄉中部）、嘉義東堡（嘉義縣番路鄉、中埔鄉、大埔鄉全部及竹崎鄉東南部），也就是阿里山山脈西側地帶的村落（如圖 1）。<sup>84</sup>

誠如前述，我們瞭解林圯埔當地的竹排放流興盛，關鍵因素就是濁水溪及清水溪的大型水力支持，成就當地竹材交易的盛況。相對來說，阿里山西側地帶雖然也是重要的竹材產地，但由於沒有溪流水力供給運出，從而發展竹材加工為竹紙的產業，形成不同於林圯埔沿山以竹排放流的產業型態。

透過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瞭解林圯埔地區得利於濁水溪及清水溪水力之便，成就竹排大規模運出。排夫藉由溪流水力將林圯埔山區的竹材送出，隨著水路來到濁水溪沖積扇頂的二八水，由此集散分為南北兩水路運送：一為東北邊由東螺溪繼續運往北斗街，最終可以抵達濱海的鹿港大街；一為西南邊水路由西螺溪及虎尾溪送出。西螺溪可以接連西螺街，至海口麥寮街及王功港；虎尾溪則可通北港街、下湖口港，往南可通往南臺灣。竹材透過清、濁水溪上下通流的河道網絡，聯繫了山區、平原直通海口，便捷的水路促進竹材販運，同時山區與海岸的經濟聯繫也在竹材水上流通的過程中展露無遺。

## 四、海岸變遷與竹材運用

19世紀彰化西部鹿港海岸地帶，因為濁水溪夾帶的大量泥沙，使得水域快速淤淺而陸化，自然環境的劇烈變化，一方面造成鹿港港道的淤淺阻塞，致使大型船舶無法靠岸，當地於是興起以竹筏作為接駁大船貨物的運輸工具，加速了對竹材的需求。另一方面，沿海形成大面積的沙埔及灘塗，也促進牡蠣養殖業的興盛，

<sup>83</sup>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本島製紙業調查書》，頁 35-46。

<sup>84</sup>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本島製紙業調查書》，頁 22、34-35。

尤其傳統上普遍使用插枝式的養蠔方法，竹枝的需求間接帶動了彰化沿海居民對於林圯埔竹材的需求市場。

### （一）鹿港港道淤積

1784年清廷正式核准鹿港與福建泉州蚶江口對渡，確立其作為中臺灣最主要港口的地位。「鹿港飛帆」是清代彰化縣境八個具有代表性的景觀之一。《彰化縣志》是如此描繪這般景象：「煙火萬家，舟車輻輳，為北路一大市鎮。西望重洋，風帆爭飛，萬幅在目，波瀾壯闊，接天無際也」。<sup>85</sup> 清代就已擁有數萬居民的鹿港，是臺灣府治（今臺南市）以北地區規模最大的市街。在活絡的貿易之下，港道上經常可見來往兩岸貿易的商船。日治時期鹿港街役場的調查資料中提到，1785-1850年（乾隆50年至道光30年）這六十餘年間是鹿港與對岸貿易的全盛時期，也可說是兩岸貿易的黃金時代，當時每日進出鹿港可載運七千石米穀的大船高達一百艘，二千石以下的船隻也不少。<sup>86</sup>

不過，鹿港這處位在大武郡溪（也稱鹿港溪）出海口的河港，不如南臺灣的打狗（今高雄港）和北臺灣雞籠（今基隆港）良港天成。在港道南方不遠就是東螺溪入海地帶，在大武郡溪與東螺溪活躍的泥沙堆積之下，港道早在18世紀就已淤淺。乾隆末年林爽文事件爆發之時，朝廷派出大量官員與軍隊渡海平亂，鹿港就是當時臺灣二處重要的進兵要口。當時閩浙總督李侍堯（1725-1788）的幕僚趙翼（1727-1814）留下這段紀錄：「幸林爽文等皆山賊，但知攻城，不知扼海口，故我師得以揚帆至。然海口舟大不能附岸，須鹿港出小船二十里來渡兵」。<sup>87</sup> 趙翼雖然沒有隨軍隊來到臺灣，不過他協助李侍堯處理公務，某種程度上也掌握了戰役當時的訊息。這段引文中「海口舟大不能附岸」的紀錄，其實已經透露出鹿港港道受到溪流泥沙堆積而淤淺的跡象，因此造成吃水較深的運兵大船無法進港靠岸，只能停泊港外，仰靠接駁。

雖說 18 世紀末葉以來，鹿港港道淤淺的問題就已經浮現，但進入 19 世紀之

<sup>85</sup> 周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彰化縣志》，上冊，頁 112。

<sup>86</sup> 鹿港街役場編，《鹿港港灣二閘スル調査》（未刊本，1923），無頁碼。

<sup>87</sup> 〈平定臺灣述略〉，收於趙翼撰、曹光甫校點，《趙翼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第三冊：皇朝武功紀盛，卷四，頁 54。



沙汕」，以及王功港（今彰化縣芳苑鄉）西邊海面的「北汕」及「南沙汕」，沙汕之間頭尾相連延伸大約有 17 公里。對應這兩處港口的沙汕之間，設有導引船隻進出港道的「招門」。<sup>89</sup> 道光年間的軍事繪圖中（圖 4），也可以見到鹿港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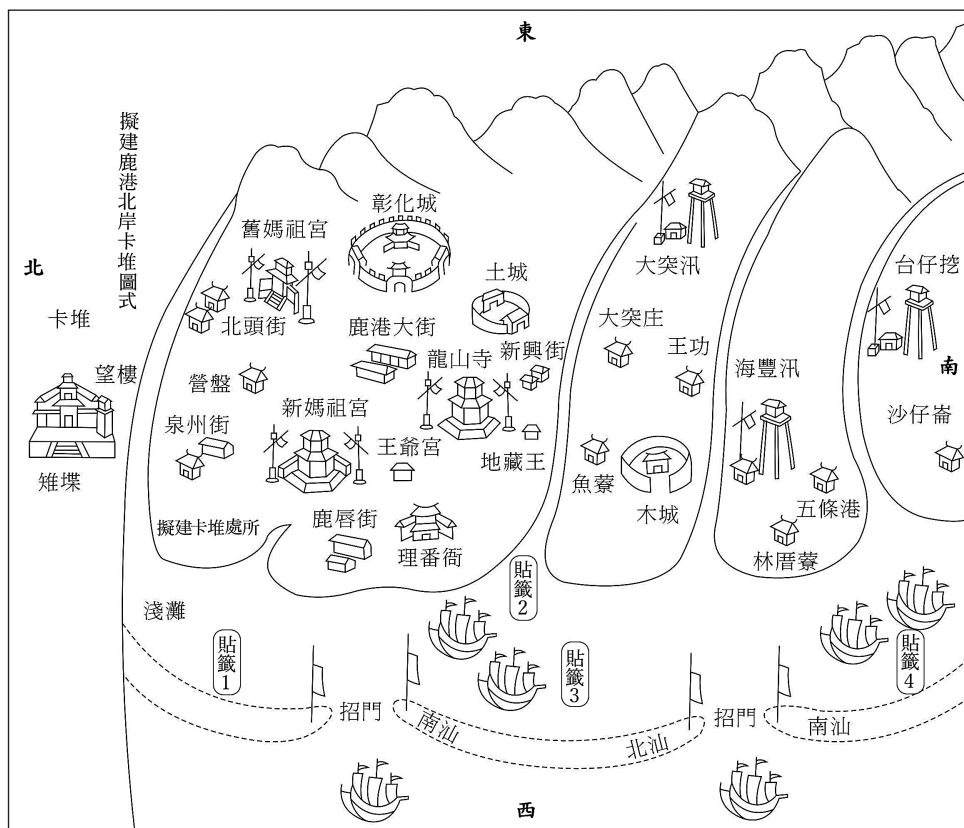


圖 4 1824 年（道光 4 年）鹿港街與周邊海域圖

- 說明：貼籤 1：新打港內招門闊九丈零水漲滿深一丈六尺水退乾深八尺零外招門闊十六丈零水漲滿深一丈三尺水退乾深四尺零南至王功港招門約七里北至鹿港北岸約十里合併聲明。
- 貼籤 2：新打港泊船港心闊十六丈零水漲滿深一丈六尺水退乾深五尺零距鹿港北岸約七里合併聲明。
- 貼籤 3：王功砲臺前泊船海面至海邊灘塗一百零丈自灘塗至砲臺九十零丈砲臺外俱係浮沙合併聲明。
- 貼籤 4：王功招內海面闊五十零丈水漲滿深一丈五尺零水退乾深九尺零招門海面闊七尺零深淺與招內相符合併聲明。

資料來源：筆者以《道光 4 年鹿仔港圖式》改繪，原圖收於陈云林总主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台湾档案汇编》，第 142 冊，頁 189-191。

<sup>89</sup> 所謂的「招門」，也作「口門」、「招口」。

海招門兩側插有旗幟，<sup>90</sup> 標記此處為入港航道，避免船隻偏移航道，同時也要由熟悉水道的水手操作船舶，並利用潮水及風向，才能順利進港。福建分巡臺灣道尹士俚（1690-?）所著《臺灣志略》就說：「鹿耳門……土人插竹繫纓布為招……海航往來，必由招中；否則，沙銜舟滯，立為浪碎」，<sup>91</sup> 可見鹿耳門港口入口插設有標旗作為航道指引，避免船隻誤觸沙汕而擱淺，抑或造成底艙的破壞，與鹿港的做法大致相同。<sup>92</sup>

進入鹿港港口招門的東側，在圖面上標示有「新打港泊船港心」，就是大船停泊下錨的處所，水深且風浪較外港平靜。值得注意的是，以「新打港」一詞指稱鹿港一帶海域，倒是首次在文獻中出現。一般而言，「新打」指的是新開通的港口。依據官方繪圖中標示「新打港」的範圍從鹿港到王功港來判斷，很可能反映的是鹿港港口淤淺，商船改由南邊的王功港出入一事。1840年（道光20年），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姚瑩給朝廷的報告中提到：「昔時鹿港口門最大，嘉慶中口門淤廢，商船由王功港出入」，<sup>93</sup> 可見19世紀初葉，鹿港海域沙汕變化無常，造成航運衝擊不小，甚至影響港口正常運作。

不過，讀完姚瑩「嘉慶中口門淤廢」的陳述之後，會讓人有種鹿港港口被泥沙覆蓋而消失的想像。仔細思考，這句話的意思或許不是說整個港口被泥沙填滿而廢除，而是強調口門是否通暢與港口正常運作有一定關聯。這也就是19世紀初葉，鹿港口門淤淺之後，由王功港替代成為鹿港外港的原因。其實姚瑩在同一篇報告中也說：「道光以來，王功港口又淤，商船皆從番仔挖出入矣。番仔挖口闊水深，外有沙汕一道，迤邐自南而北，商船自此入口，由港內經王功港而至鹿港，故以番仔挖為鹿港外口」。<sup>94</sup> 由此可知，面對臺灣西海岸沙汕變化無常，正口鹿港的外港也接連改易。即使如此，姚瑩也提到番仔挖港「商船自此入口，由

<sup>90</sup> 〈道光4年鹿仔港圖式〉，收於陳雲林總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台灣檔案匯編》，第142冊，頁189-191。

<sup>91</sup> 尹士俚纂修、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臺灣志略》（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245-246。

<sup>92</sup> 鄭維中注意到插旗為號的做法，早在荷治時期就已經被荷蘭人落實於臺灣西南海岸的大員港。請參閱鄭維中，〈荷治時期大員港的入港規範：駁船、旗號與盪纓〉，收於劉益昌、賀安娟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Ⅴ：早期南瀛》（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9），頁155-184。

<sup>93</sup> 〈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收於姚瑩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中復堂選集》（文叢第83種，1960；1867年原刊），第一冊，頁80。

<sup>94</sup> 〈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頁80。



港內經王功港而至鹿港」，說明儘管鹿港及王功港的招門淤廢，但是從番仔挖（今彰化縣芳苑鄉）進港之後，航行沙汕環繞的內港水域亦可抵達王功港及鹿港。此外，道光年間的《彰化縣志》中也記錄：「以鹿港為正口，然沙汕時常淤塞，深則大船可入，淺則小船得到」。<sup>95</sup> 反映出雖然鹿港海域沙汕變化不定，但並非長期處於淤塞狀態。一般而言，在漲潮之際，大船仍可循著特定較深的水道進港，而較淺的地方則可以利用小船出入，說明並非淤淺而完全喪失航運價值。

在嘉慶朝「擬建鹿仔港北岸卡堆雉堞望樓圖說」（圖 3）中，除了繪製 6 艘三桅大船航行的「新打港」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圖面中間畫有 3 艘單桅帆船駛入的東西向河道。這條河道應該就是大武郡溪，鹿港當地居民多以「舊港溝」或「鹿港溪」稱之，是普遍認知清代的港道所在。港道與當地的「舊街」範圍平行，大致從西邊的泉州街、埔頭街連過瑤林街一線東南而行，最終到龍山寺附近留下「港底」這一地名，表明這是港道最內延的地帶。林會承的研究很早就注意到「舊街」店屋的建築特色與碼頭的對應關係。<sup>96</sup> 這處輸送貨物的船頭行聚集之地，發展出與港道垂直的店屋，狹長且深邃的店屋，分作前、中、後三段，各具功能。在港道卸貨後，即可由後門搬運入店，倉儲於中段，最終貨物可移至前段鋪面販售，此即清末鹿港文人洪棄生（1866-1928）所見「店前可以驅車，店後可以繫榜」的情景。<sup>97</sup> 由此可知，舊港溝港道緊接著「舊街」商業區，強化了貨物起落、搬運與銷售的功能，使商貿活動得以順暢流通。

1820 年代，舊港溝面臨港道淤積而衝擊鹿港商貿活動的棘手問題。由於濁水溪水系的東螺溪支流連接舊港溝河道，在含沙量高的溪流堆積作用之下，港道逐漸淤淺。此外，往返兩岸的商船經常在回航之前，會將稱作「船棟」的壓艙砂土傾倒在港道，長久下來自然也會造成淤積。<sup>98</sup> 1822 年（道光 2 年）11 月，鹿港的泉、廈郊商人遭遇舊港溝淤塞造成貨物不通的窘境，於是向新到任的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1764-?）陳請，獲得官府「示諭商船捐銀挑濬，以利舟楫」。最後在泉郊金長順行夥黃英才與管理廈船事務的洪馨共同協助之下，「公議每船派捐

<sup>95</sup> 周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彰化縣志》，上冊，頁 115。

<sup>96</sup> 林會承，《清末鹿港街鎮結構》（臺北：境與象出版社，1985），頁 67-70。

<sup>97</sup> 〈鹿港乘桴記〉，收於洪棄生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寄鶴齋選集》（文叢第 304 種，1972；1917 年原刊），頁 85。

<sup>98</sup> 〈鹿港浚河〉，《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3 月 20 日，第 3 版。

番銀四十圓，共收番銀二千圓，雇夫挑濬完竣」。<sup>99</sup> 由此可知，鹿港當地在面對港道淤積後的因應辦法是向官府核備，再由泉、廈郊這兩大商人團體出面向各自管理的船戶攤派銀錢，進行清淤。依每船收取番銀 40 圓，最終收得番銀 2,000 圓來看，共計有 50 艘泉廈郊所屬商船。即使疏濬做法只能治標而未能治本，卻是當時人們認為最有效而積極的辦法。

透過上述討論可知，19 世紀初葉鹿港正面臨著港道淤淺的問題。當地在面對這一波環境變遷的衝擊時，一方面發展出小船接駁大船的辦法，使貨物得以順利流通；一方面也透過泉、廈郊商船攤派經費，進行港道疏濬。

## （二）鹿港周邊海域淤淺與竹筏接駁

在舊港溝淤積的同時，鹿港沿岸海域也面臨積泥成埔的陸化衝擊，並留下歷史圖像。延續嘉慶朝的「擬建鹿仔港北岸卡堆堆堞望樓圖說」，1824 年官府重新繪製該圖（圖 4），並添加新的資訊。圖面上除了新添加許多重要廟宇、官衙及軍事設施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鹿港近海一帶特別被標記為「淺灘」。<sup>100</sup> 「淺灘」的出現，顯示原本可供船舶航行的港道，因為泥沙堆積加劇，逐漸陸化成為沙埔，造成海岸線往西推移。這意味著商船得要停泊在距離鹿港街更遠的海面，商品無法直接上岸，從而衍生出近海貨物接運的駁船事業。

進一步來說，港口淤積很容易讓人們聯想起正口商業衰敗，但有意思的是，在相關紀錄與研究中所呈現清代鹿港商貿最為繁盛的時期要屬嘉道年間，實際上正是當地海岸自然環境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施添福對於鹿港古蹟的歷史地理意義的詮釋中指出，1785-1835 年（乾隆 50 年至道光中葉），鹿港進入了全盛時期，也就是方志中所記「鹿港飛帆」的黃金時代，不僅海峽兩岸商業貿易繁盛，官商在此時也累積了充裕的資本，並投注於鹿港當地的公共建設，今日我們所見不少規模宏敞、精雕細琢的廟宇與建物，基本上都在此時創立或重修。<sup>101</sup> 但誠如前述，這

<sup>99</sup> 〈審明安溪縣民盧允霞京控臺灣配運官谷索費苦累商船案〉，收於陳雲林總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台灣檔案匯編》，第 147 冊，頁 243-244。

<sup>100</sup> 〈道光 4 年鹿仔港圖式〉，收於陳雲林總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台灣檔案匯編》，第 142 冊，頁 189-191。

<sup>101</sup> 相關討論請參閱施添福，〈鹿港古蹟的歷史地理意義〉，收於施添福、林會承、陳國川撰，《鹿港鎮志：地理篇》（彰化：鹿港鎮公所，2000），頁 235-283。

段期間的鹿港周邊海域及港口正面臨劇烈的泥沙淤積與水域陸化。面對這番自然環境變化的衝擊，鹿港作為清代中臺灣最大商港，如何維繫兩岸貿易正常運作及貨品暢通，不容忽視的關鍵角色是駁船的普及。

駁船可以說是因應鹿港西海岸環境變動而出現的交通方式，因為船體小、吃水淺的特性，容易在沙洲地帶移動，具有高度機動性，成為停泊外港大船接運貨物的首選。鹿港當地運用駁船的實例，具體呈現在閣港大廟龍山寺的重修工程上。龍山寺為舉人林廷璋（生卒年不詳）及八郊等商紳共同倡議重修，修建工程從1829年（道光9年）冬季興工開始，歷時一年多，至1831年（道光11年）2月竣工。今日廊道還留有3塊道光11年的「泉廈郊商船戶捐題緣金」碑，列明船戶捐題、開支情況。<sup>102</sup> 特別的是，碑記中以「泉廈駁船戶起運庭石開列諸船牌名」為項目，強調建材搬運情形。「庭石」就是指鋪設在龍山寺建築四周大量的石材，這些石材採自福建，主要由「泉廈駁船戶」共41艘，分成73次由番仔挖接運到鹿港（詳如表3），供給龍山寺重修。「泉廈駁船戶」應是指道光年間鹿港海域淤淺，泉、廈商船主要改由番仔挖港進出，停在內港再透過駁船將貨物轉運到鹿港，這些駁船分別屬於泉郊與廈郊管理。目前因資料有限，仍無法進一步將表3中的船戶進行團體分類。但是，「泉廈駁船戶」的出現，反映出19世紀鹿港當地最主要的兩大商人團體——泉郊、廈郊面對鹿港海域淤淺問題時，其因應之道就是籌組駁船，處理各自商船從番仔挖到鹿港之間沿海貨運接駁的問題。

駁船究竟是哪一種類型的船舶，頗令人好奇。在洪棄生〈鹿港乘桴記〉一文，記述了清末鹿港駁船接運貨物的情景：

鹿港通海之水已淺可涉矣，海艚之來，止泊於沖西內津；……緬載之往來，皆以竹筏運赴大艚矣。然是時之竹筏，猶千百數也；衣食於其中者，尚數百家也。<sup>103</sup>

由引文可知，竹筏作為駁船，被廣泛運用於鹿港海域的貨物接駁。誠如前述，自19世紀初葉以來，鹿港近海水域漸次淤積而陸化，大型船隻只能停泊於「新打港」，

<sup>102</sup> 〈泉廈郊商船戶捐題緣金碑〉，鑲嵌於鹿港龍山寺左側廊道牆面，筆者田野抄錄。

<sup>103</sup> 洪棄生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寄鶴齋選集》，頁85。

表3 1831年（道光11年）泉廈駁船起運龍山寺庭石狀況

序號	船戶名	接駁次數	序號	船戶名	接駁次數
1	新益勝	13	22	彝林船	1
2	舊益勝	12	23	林轉船	1
3	金捷發	2	24	芳泰船	1
4	金順興	2	25	正利船	1
5	金德順	2	26	聯成船	1
6	金順源	2	27	黃發興	4
7	金合興	1	28	黃順利	1
8	金和益	1	29	黃恒隆	1
9	金寶盛	1	30	王忠祿	1
10	金捷興	1	31	盧應	1
11	金合順	1	32	蔡順安	1
12	金益順	1	33	蔡合興	1
13	金東順	1	34	陳進發	2
14	金福春	1	35	陳陞順	1
15	金進利	1	36	陳金興	1
16	金源盛	1	37	陳萬興	1
17	金永順	1	38	陳進益	1
18	許江船	2	39	施順源	1
19	協興船	1	40	康奇石	1
20	德亨船	1	41	洪德協	1
21	德盛船	1			

資料來源：〈泉廈郊商船戶捐題緣金碑〉，鑲嵌於鹿港龍山寺左側廊道牆面，筆者田野抄錄。

僅有中小型船隻可以順著舊港溝進到舊街碼頭地帶。1854年（咸豐4年）濁水溪氾濫，一時含沙量甚高的混濁溪水由支流湧入舊港溝，致使淤積的情況更加嚴峻。<sup>104</sup> 這次水災過後，連通海域的舊港溝港道淤積到甚至涉水就可以通行，船舶僅能停泊在距離舊港溝出海口不遠、時稱「沖西」的內港水域。當時貨物網載相當仰賴竹筏駁運，其數量可說是成千上百，靠操作駁船維生者，也有數百家之多。<sup>105</sup> 今日在舊港溝出海口附近仍留有「筏子腳」（pâi-á-kha，今鹿港鎮東石里）的地名，是早期停放竹筏的處所，<sup>106</sup> 顯示鹿港曾經大量使用竹筏，並且匯聚停泊在一處而成為

<sup>104</sup> 〈鹿港の貿易〉，《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3月7日，第2版。

<sup>105</sup> 其實19世紀末以來，港口的淤塞不僅發生在鹿港，亦發生在南臺灣的安平等地，使得竹筏成為臺灣西海岸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甚至因為竹筏廣布港口，而有「竹筏港」的地名出現。請參閱吳建昇，〈「竹筏港」水道之初探〉，《臺南文獻》（臺南）1（2012年7月），頁10-26。

<sup>106</sup> 陳國川、翁國盈編纂，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一）彰化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上冊，頁168。

當地地景，最後被轉化為地名。此外，鹿港周邊低潮線以外的海域被漁民視為「外海」，自清代以來這裡就是竹筏從事近海漁業活動的場所，昔日經常可見竹筏廣布的景象，因此當地人也習慣以「排海」稱呼此片海域。<sup>107</sup>

由上述討論，我們可以這麼理解，鹿港採用竹筏作為駁船的辦法，可能是從普遍被運用於臺灣西部沿海漁業的竹筏發展而來，由於造價低廉且工序較簡易，經過改良成為可以運載貨物的型態。循此脈絡，於是以大竹編排組成的竹筏，便在19世紀鹿港港口淤積的情形之下，成為接駁船貨起落的替代方案。這些因素導致當地對林圯埔沿山地區竹材需求倍增，無形之中也促成山林與海岸銜接，具體展現山通大海的物流歷程。

### （三）養蠔與竹材的運用

鹿港海岸的自然環境變遷，除了造成港道的淤塞之外，同時濁水溪的泥沙冲刷入海，亦導致鹿港海岸迅速陸化，大範圍生成的浮覆灘塗地被居民開闢成蠔圃，造就了當地養蠔業的繁盛。

1811年「擬建鹿仔港北岸卡堆雉堞望樓圖說」（圖3）中的貼籤寫道：「王功砲臺前泊船海面至海邊灘塗一百零丈，自灘塗至砲臺九十零丈，砲臺外俱係浮沙，合併聲明」。<sup>108</sup> 由此段描述可知，王功砲臺附近為大潮高潮線與低潮線之間的潮間地帶，也就是引文中所謂的「海邊灘塗」，此外砲臺外的地區也被強調「俱係浮沙」，可見19世紀初王功港已經逐漸陸化，形成沙洲與灘塗的地理景觀。

在王功港陸化的過程中，當地也興起養殖牡蠣的產業。據說最早養殖牡蠣的地方是漢寶（今彰化縣芳苑鄉）近海稱作「石仔盤」的地方，後來因為海水侵蝕，造成大部分蚵田陷入海中消失。石仔盤以南的蚵田則有海坪閣漚、湖漚、二十三份、八份、添丁漚、天送漚、中盤。<sup>109</sup> 上述蚵田分布於濁水溪河口以北的潮間地帶，北與福寶海坪（今彰化縣福興鄉）交界，南至永興海埔地（今彰化縣芳苑鄉）

<sup>107</sup> 顏秀玲，〈北頭漁村漁民生活方式的變遷〉，收於余光弘編，《鹿港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3），頁53。

<sup>108</sup> 〈嘉慶16年閩浙總督汪志伊等呈擬建鹿仔港北岸卡堆雉堞望樓圖說〉，收於陳雲林總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台灣檔案匯編》，第123冊，頁26-28。

<sup>109</sup> 洪一平，〈王功地區蚵田文化景觀及產業發展之研究〉（彰化：大葉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7），頁61-62。

的海坪，南北約12.7公里，寬約2.5公里，養殖牡蠣面積大致為1,500公頃。<sup>110</sup>

王功港北邊的鹿港，在海岸陸化的過程中，海埔新生地浮覆而促成蚵田的成立。清代鹿港沿海的蚵田，主要分布在鹿港溪出海口往北延伸至洋子厝溪出海口一帶區域。<sup>111</sup> 戰後當地延續清代以來的牡蠣養殖事業，全盛時期面積達到2,000公頃，年產蚵肉120萬公斤，於是大面積的蚵田成為當地特殊景觀，「蠔圃洄潮」更為鹿港八景之一。<sup>112</sup> 不過，由於沿海漂沙持續，海岸線不斷推移，同時也造成蚵田被沙土所掩埋而不斷南移，最終因為彰濱工業區的設置，鹿港的蚵田就此消失。<sup>113</sup>

清代彰化西部沿海的養蠔，廣泛使用插竹式的養蠔技法，此法在清初已經使用於臺灣，如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所記：「蠔，蠔房也，即以為取之之名；用竹二，長丈餘，各貫鐵於末如剪刀，於海水淺處鉤致蠔房」。<sup>114</sup> 插竹式又稱簍插式或簍竹式，彰化沿海居民多以「插蚵枝」（tshah-ô-ki）稱之。蚵農一般會依照當地養殖水域的深度，將竹材加工為長30-60公分，寬度約3-5公分的竹枝，並將一端削尖，方便插入沙土之中。這些經過加工曝曬的竹枝，一端會被夾上牡蠣殼，以提高蚵苗的附著率，最後種插於潮間帶或淺海區域。<sup>115</sup>

用來插養牡蠣的竹材主要是籐竹。據表4日治時期養蠔業狀況所示，彰化西部沿海養蠔用的竹材有兩個來源：一為濁水溪中游的林圯埔地區，一為烏溪中游的大肚、快官一帶。林圯埔山區運出的籐竹大量被運用於今彰化縣大城鄉、芳苑鄉一帶的沿海蚵田，如下海墘厝庄、頂海墘厝庄、西港庄、三塊厝庄（以上為今彰化縣大城鄉）、新街庄、番挖庄、王功庄（以上為今彰化縣芳苑鄉）；而鹿港街、草港尾庄（今彰化縣鹿港鎮）、下見口庄（今彰化縣線西鄉）、新港庄（今彰化縣伸港鄉）則運用來自大肚及快官一帶的竹材。

導致彰化沿海養蠔利用的竹材來源差異，應該考慮蚵田位置與溪流的關係。前述今彰化縣大城鄉、芳苑鄉一帶的蚵田運用林圯埔的籐竹，主要原因正是這些蚵田

<sup>110</sup> 洪一平，〈王功地區蚵田文化景觀及產業發展之研究〉，頁63。

<sup>111</sup> 顏秀玲，〈北頭漁村漁民生活方式的變遷〉，頁74。

<sup>112</sup> 施文炳著、洪惠燕編，《臺灣末代傳統文人：施文炳詩文集》（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8），頁190-191。

<sup>113</sup> 顏秀玲，〈北頭漁村漁民生活方式的變遷〉，頁74。

<sup>114</sup> 黃叔璥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海使槎錄》（文叢第4種，1957；1736年原刊），頁22。

<sup>115</sup> 萱場三郎，〈安平鹿港間水產業〉，收於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編，《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報文：第一卷》（臺北：該課，1898），頁246-248。

表4 日治時期彰化西海岸地帶養蠟業狀況（1914-1915）

蠟田所在 街庄名稱	養蠟業者		築場面積 （甲）	插筴數量 （支）	筴材料 種類	竹材產地	竹材供給 月份
	戶數	人數					
下海墘厝庄	80	120	1.5000	79,218	籐竹	南投 林圯埔	自9月至12月
頂海墘厝庄			1.0000	52,812			
西港庄			2.0000	105,624			
三塊厝庄			1.0000	52,812			
新街庄			2.0000	105,624			
番挖庄	227	514	12.0000	633,744	籐竹	南投 林圯埔	自9月至12月
王功庄			6.0000	316,872			
鹿港街	20	60	14.0000	821,520	籐竹	大肚方面	自9月至隔年2月
草港尾庄	60	200	18.9000	1,663,578	籐竹	快官	自9月至隔年2月
下見口庄	2	18	5.0000	440,100			
新港庄	69	110	42.0000	3,696,840			

資料來源：〈本島の牡蠣養殖業調査〉，收於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臺灣之水產：第四號》（臺北：該局，1915），頁 26-29。

分布於清代西螺溪與東螺溪出海口的南北兩岸，這兩條溪流的上游即是作為當地重要竹材供應地的林圯埔。戰後，當地仍然持續使用林圯埔地區的竹材，通常成捆的竹排由林圯埔沿山放流運出後，順著溪水可以抵達濁水溪出海口的海墘厝（今大城鄉），再沿著海溝北上至番仔挖及王功，如果受到季風或潮汐影響以致無法沿海放流，居民則會駕駛牛車前赴濁水溪口搬運。<sup>116</sup> 至於鹿港、線西、伸港地區運用來自大肚及快官一帶的竹材，則是因為其位在烏溪出海口南岸地帶。<sup>117</sup> 由此可以瞭解，竹材流通是通過溪流水運而與蠟田之間構成聯繫關係。

清代彰化西海岸養蠟使用竹材的狀況，未留下太多紀錄，但是日治時期的統計資料，卻可以提供具體的參考數據。依據表4養蠟業狀況顯示，彰化沿海養蠟以番挖庄與王功庄最為興盛，共有227戶、514人投入18甲蠟田的經營，其次為番挖庄南邊的下海墘厝庄等五庄，共有80戶、120人經營7.5甲的蠟田。這兩大養蠟區域相當程度仰賴林圯埔竹材的供應，以一年期而言，番挖庄與王功庄需要使用950,616支，下海墘厝庄等五庄則需396,090支，兩區合計1,346,706支。這些用來養

<sup>116</sup> 林連宗，〈憶早年王功風采〉，收於謝四海主編，《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第一輯》（彰化：二林社區大學，2014），頁 144；洪勝湖，〈芳苑歷史掇拾〉，收於謝四海主編，《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第四輯》（彰化：二林社區大學，2017），頁 38。

<sup>117</sup> 雖然彰化地區養蠟調查報告中指出，鹿港、線西及伸港使用烏溪流域的竹材，但鹿港當地的製香及竹工藝業者主要仍使用林圯埔地區的竹材，詳本文第三節討論。

蠟的竹枝屬於耗材，不耐長時間浸泡於海水之中且容易朽壞，大約一至二年就必須易換。「蚵枝」持續的替換更新，意味著需要林圯埔地區不斷供給竹材，這也反映出山林與海岸之間，在竹材供給與需求的市場機制運作之下，兩地互相銜接的緊密關係。

## 五、結論

本文從清代臺灣中部林圯埔淺山丘陵地帶的林相景觀變化著手，探討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這一百多年間，林圯埔山區地景由雜木叢生轉變成為滿山遍野的竹林景觀背後原因。其關鍵主要是因為彰化平原沿海自然環境的變化，在鹿港海岸淤積陸化的過程中，一方面插竹式的養殖牡蠣業開始興盛，一方面則是對於作為運輸工具的竹筏需求提升，累加造成對林圯埔地區竹材供應需求的增加。在竹林產業的榮景之下，林圯埔大規模種竹而改變了山林景觀，並成為20世紀初期全臺最大的竹材產地。

18世紀以來，漢人大規模移居林圯埔地區，拓墾活動的進行改造了當地的地景。林圯埔地區多為山地等邊際土地，耕地相當有限，漢人到來之後，逐漸適應氣候環境，並種植適宜的作物，其中竹子因為適應當地地形，竹材與竹筴又可供給日常生活所用，收益不亞於米穀生產，於是逐漸發展成為當地重要的竹林產業。漢人移民也陸續移植原鄉的竹種，使得林圯埔沿山地區發展出多元的竹林樣態。

19世紀之初，竹林買賣的交易行為在當地已經存在，竹材也在這一過程中成為商品標的。由於商品化的推展，使得居民刻意種植具經濟價值的竹林，而當地雜木叢生的原始山林景觀，便在這波商業活動中逐漸被改造，取而代之的是翠竹滿布的地景。至20世紀之初，滿山竹林的樣貌，甚至被人們認為是林圯埔原生的「自然」山林景觀。

在林圯埔沿山掀起山區物產商品化的風潮之下，竹材成為山林經濟的重要物產，以溪河放流竹排的流通方式，更是19世紀以來當地重要的交易型態。林圯埔當地因為具備地理環境上的優勢，特別是獲益於濁水溪與清水溪兩大溪流的水力支持，竹排得以透過便捷且貫通的河道網絡，從山區運往廣袤的濁水溪沖積扇平



原，再由下游各溪流連接北斗、西螺等中大型街市，最終通往西海岸的鹿港，形成了山海相通的竹材水上流通網絡。

19世紀彰化西部沿海的自然環境變遷與濁水溪的沙土堆積，造成海岸陸化，大面積沙埔地的浮出，促進沿海地區養殖牡蠣的興盛，特別是插枝式的養殖方法，帶動了竹材的市場需求。此外，鹿港港道的淤淺也使得大型船舶無法進港，於是興起以大竹編製的竹筏普遍被使用作為接駁貨物的船隻，也開啟對竹材的需求。林圯埔地區在這一熱絡的竹材市場帶動之下，進而大規模種植竹材以擴增供應數量，意外改造了原有的山林景觀。

總結來說，本文探討19世紀林圯埔竹材與鹿港海岸的關聯，指出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林圯埔沿山地景變化的根本原因，與彰化西部沿海自然環境的變化大有關聯。19世紀初竹材流通興起的同時，帶動一波林圯埔山區物產商品化的趨勢，而伴隨著鹿港海岸淤積這一自然因素的影響，養蠔業與竹筏駁運的興盛，間接促成竹材的市場需求增加，使得以鹿港為核心的彰化海岸地帶與沿山的林圯埔建立緊密的經濟連結，也具體呈現了山通大海的格局。同時，這一連結山海的經濟活動，顯示出漢人活動從西部平原推向沿山地帶，由海口走向山區，成為19世紀臺灣重要的社會動態。

## 引用書目

《臺灣日日新報》

〈泉廈郊商船戶捐題緣金碑〉，鑲嵌於鹿港龍山寺左側廊道牆面，筆者田野抄錄。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檔案，檔號：0039/316.1/1/01/0001/01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藏。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567600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不著撰者，〈鹿港風俗一斑〉（1896，未刊本）。

林邦光親筆，〈林邦光生平記事〉（不著年月，未刊本，林惠朗收藏，林宜敬提供）。

陳鳳儀，〈竹山郡管內概要〉（1932，未刊本）。

鹿港街役場編，〈鹿港港灣二関スル調査〉（未刊本，1923）。

楊朝傑訪問、記錄，〈許永橙先生訪問紀錄〉（2022年7月4日於鹿港許宅，未刊稿）。

丁玉書

2006 《勿忘草》。彰化：丁玉書。

三菱製紙株式会社社史委員會（編）

1962 《三菱製紙六十年史：1898-1958》。東京：三菱製紙株式会社。

不著撰者

1985 《集集堡紀略》。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尹士儉（纂修）、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2005 《臺灣志略》。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子定、郭寶章（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1 《臺灣之竹林與竹材》，臺灣研究叢刊第14種。臺北：臺灣銀行。

永山規矩雄

1932 〈臺灣に於ける竹材利用の概要〉，《臺灣の山林》（臺北）81: 59-79。

安倍明義（編）

1938 《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

何培夫（主編）

1994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縣市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1996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吳建昇

2012 〈「竹筏港」水道之初探〉，《臺南文獻》（臺南）1: 10-26。

李泰翰

2007 〈清乾隆年間臺灣戰圖製作經緯〉，《故宮學術季刊》（臺北）25(2): 139-178。

沈葆楨（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9 《福建臺灣奏摺》，臺灣文獻叢刊第29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周 璽（總纂）、洪燕梅（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2006 《彰化縣志》，上、下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維強

2015 〈銅版汗青：欽定平定準噶爾回部戰圖之委法製作〉，《故宮文物月刊》（臺北）393: 4-17。

林文燦（總編纂）

2009 《鹿谷鄉志》。南投：鹿谷鄉公所。

林玉茹

2015 〈清中叶台灣三大區域型經濟區的成立（1784-1850）〉，《東北史地》（長春）2015(1): 58-69。

2016 〈第三篇 近代台灣經濟地理（清統治時期）〉，收於吳松弟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地理（第六卷）閩台近代經濟地理》，頁 339-345。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林玉茹、劉序楓（編）

2006 《鹿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陸的貿易文書（1895-189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林石陣（編修）

1978 《平和林灶公渡臺誌暨族譜》。南投：林灶公祭祀公業。

林長金

1937 〈社子國營造林地に於ける蔴竹の造林並栽培經營法に就て〉，《旗山の林業》（高雄）6: 39-53。

林連宗

2014 〈憶早年王功風采〉，收於謝四海主編，《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第一輯》，頁 137-145。彰化：二林社區大學。

林會承

1985 《清末鹿港街鎮結構》。臺北：境與象出版社。

林滿紅

2006 〈貿易與清末台灣的经济社会变迁（1860-1895）〉，收於吳松弟主編，《中國百年經濟拼圖：港口城市及其腹地與中國現代化》，頁 138-157。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林漢梁（編著）

2000 《竹山林業史誌》。南投：頂林林業生產合作社。

青井哲人（著），張亭菲、楊朝傑（譯）

2018 〈以竹為特色的市鎮：臺灣濁水溪流域的內陸河港市鎮群與竹造街屋的歷史意義〉，《建築學報》（臺北）104: 103-121。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

1991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

姚 瑩（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9 《東溟奏稿》，臺灣文叢刊第 4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0[1867] 《中復堂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83 種，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施文炳（著）、洪惠燕（編）

2008 《臺灣末代傳統文人：施文炳詩文集》。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施添福

2000 〈鹿港古蹟的歷史地理意義〉，收於施添福、林會承、陳國川撰，《鹿港鎮志：地理篇》，頁 235-283。彰化：鹿港鎮公所。

泉風浪

1928 《臺灣の民族運動》。臺中：臺灣圖書印刷合資會社。

洪一平

- 2007 〈王功地區蚵田文化景觀及產業發展之研究〉。彰化：大葉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洪棄生（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 1972[1917] 《寄鶴齋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30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洪勝湖

- 2017 〈芳苑歷史掇拾〉，收於謝四海主編，《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第四輯》，頁32-44。彰化：二林社區大學。

洪麗完

- 2011 〈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臺灣史研究》（臺北）18(1): 41-102。
- 2013 〈清代臺灣邊區社會秩序之考察：以濁水溪、烏溪中游之「亢五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臺北）20(4): 1-50。

倪贊元（纂輯）、張光前（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 2011 《雲林縣採訪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唐贊袞（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 1958[1891] 《臺陽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3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高宜君

- 2015 〈毫芒之測：乾隆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銅版畫探微〉，《故宮文物月刊》（臺北）392: 70-82。

國分直一

- 1968 《台湾の民俗》。東京：岩崎美術社。

張永楨

- 2010 〈清代竹山、鹿谷地區的農作經營：以古文書和文獻互相印證〉，收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等編，《第四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9-76。臺中：逢甲大學出版社。

張素玢等（撰稿）、張哲郎（總編纂）

- 1997 《北斗鎮志》。彰化：北斗鎮公所。

張素玢

- 2014 《濁水溪三百年：歷史、社會、環境》。新北：衛城出版社。

張毓哲

- 2018 〈日治時期古坑沿山地區的竹紙產業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莊英章

- 1977 《林圯埔：一個臺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連橫

- 1962[1921] 《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正祥

- 1993 《臺灣地誌》，中冊。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陳哲三（總編纂）

- 2002 《竹山鎮志》。南投：竹山鎮公所。

陳國川、翁國盈（編纂），施添福（總編纂）

2006 《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一）彰化縣》，上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陈云林（总主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編）

2009 《明清宮藏台灣檔案汇编》，第 123、142、147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

陳壽祺（總纂）、洪燕梅（點校）

2007 《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上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鹿港街第二公學校（編）

1931 《鄉土誌》。彰化：鹿港街第二公學校。

曾品滄

2012 〈塭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臺灣史研究》（臺北）19(4): 1-47。

曾獻緯

2010 〈日治時期竹山地區的竹林產業發展〉，《暨南史學》（南投）13: 107-158。

黃允哲（主編）

2019 《鹿谷黃錫三秀才文集》。南投：南投縣彬彬社文化發展協會。

黃叔墩（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7[1736] 《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黃素真

2005 〈業戶許廷瑄與林圯埔大坪頂地區的拓墾發展〉，《臺灣文獻》（南投）56(4): 23-89。

2009 〈土地、國家與邊陲社會：林圯埔大坪頂的地方性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博士論文。

2011 〈由地方現存史料談清代大坪頂（鹿谷鄉）的茶業發展〉，《臺灣文獻》（南投）62(2): 145-179。

塗有忠（主編）

1997 《下崁采風錄》。南投：南投縣竹山鎮中和國民小學。

新道滿（編）

1938 《ロ-マ字發音 臺灣市街庄名の讀み方》。東京：東都書籍株式會社。

楊朝傑

2015 〈清代臺灣西螺街的形成與發展〉，《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臺南）9: 5-39。

萱場三郎

1898 〈安平鹿港間水產業〉，收於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編，《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報文：第一卷》，頁 232-261。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

彰化縣福興鄉公所（編）

2022 《福興鄉原始典誌（增訂三版）》。彰化：彰化縣福興鄉公所。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2 《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 15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

1909 《本島製紙業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1915 《臺灣之水產：第四號》。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

1921 《臺灣之農具》。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趙翼(撰)、曹光甫(校點)

2009 《趙翼全集》，第三冊。南京：鳳凰出版社。

劉枝萬

1961 《南投縣風俗志 宗教篇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

蔡炎城

1983 《二水軼聞》。臺北：蔡炎城。

鄭維中

2019 〈荷治時期大員港的入港規範：駁船、旗號與盪纓〉，收於劉益昌、賀安娟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V：早期南瀛》，頁 155-184。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盧正恒

2021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的繪圖觀點及與銅版《得勝圖》比較〉，《臺灣史研究》(臺北) 28(4): 41-120。

盧雪燕

2007 〈鏤銅鑄勝：院藏清宮得勝圖銅版畫〉，《故宮文物月刊》(臺北) 293: 40-51。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190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第二部 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下卷。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顏秀玲

1993 〈北頭漁村漁民生活方式的變遷〉，收於余光弘編，《鹿港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頁 49-77。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藤森狂花

1929 〈竹山の竹の由來〉，《臺法月報》(臺北) 27(12): 110-111。

## **Relationship between Bamboo Trade in Linyipu and Transformation of Lukang Coastline in 19<sup>th</sup> Century**

Chao-chieh Yang

### **ABSTRACT**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spanning from the late 18<sup>th</sup> to the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the landscape of the Linyipu mountainous region in Central Taiwan underwent dramatic transformations. Over time, the original dense jungles in the region gradually gave way to expansive bamboo forests.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primarily driven by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changes along Taiwan's western coast during the 19<sup>th</sup> century, which spurred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demand for bamboo.

Investigating transformations of the Lukang coastline reveal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eclaimed land along the shoreline boosted the thriving coastal oyster farming. The cultivation of oysters using bamboo structure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increased demand for bamboo. Furthermore, siltation of the Lukang harbor channel necessitated the widespread use of bamboo rafts, establishing them as a prevalent mode of transport during that era. These factors collectively escalated both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bamboo in the region.

The strategic hydraulic advantages provided by the Qingshui and Zhuoshui Rivers facilitated the rapid and extensive export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bamboo, thereby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mboo forestry industry. Eventually, bamboo forests came to dominate the landscape of the Linyipu mountainous region.

The cultivation and widespread adoption of bamboo in Linyipu not only highlight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untainous regions and coastal areas, but also provide a case study for exploring private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commodity circulation in Taiwan under Qing rule. Simultaneously, this economic activity linking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illustrates the progression of Han migration from the western plains to the mountains, extending from the seaports into the hilly regions – a notable trend in 19<sup>th</sup>-century Taiwanese society.

**Keywords:** Zhuoshui River, Bamboo Raft, Oyster Culture, Mountain Forest Landscape, Bamboo Forest Industry, Zhu Shan